

北宋东京开封府城的形制布局

The Plan and Layout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Dongjing Kaifeng—fu

孟凡人

Meng Fanren

内容提要：

根据考古调查，试掘和发掘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在过去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北宋东京开封府城的形制布局进行了复原式的分析、探讨和研究。指出北宋开封城三城环套，外城墙出现瓮城、敌楼、团楼、战棚和马面，城内辟四条御路，四河贯都，街市和街巷取代规整划一的市和里坊，城内功能区划出现新格局；以及皇城呈环套宫城之势，宫城出现东、西华门；主要宫殿平面呈工字型，殿后有阁，宫殿配置出现双轴线；宣德楼“列五门”，“曲尺朵楼”，“下列两阙亭相对”；形成准T字形宫廷广场和千步廊雏型等，是开封城形制布局出现的新特点。这些新特点大都对后世都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开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都城形制布局演变进程中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东京开封府 外城 内城 宫城 皇城 宫廷广场 千步廊 御路 街巷 街市 厢房 四河贯都 形制 布局 功能分区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rchaeological surveys, test excavations and unearthed materials, combined with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and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the author conducts reconstructive analysis,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form and layout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Dongjing, better known as Kaifeng fu.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Song Dynasty Kaifeng was enclosed by three sets of walls. At the outer city wall, the wengcheng (barbican), dilou (defense towers), tuanlou (defense gate), makeshift soldier shelters and mamian (defense ramps) have been uncovered. Inside the city four imperial roads have been identified and four rivers flowed through the city. Markets and alleys have been identified and these replaced the Tang dynasty markets and lanes, as there was a new layout in the functional section of the city in the Song. The inner walled cities called huangcheng (imperial city) and gongcheng (palace city) have also been identified, as have the gates called Donghuamen and Xihuamen in the palace city walls. The main buildings of the palace are laid out to resemble the Chinese character '工', and behind the main audience hall are pavilions and palaces along two axes. Behind Xuande Lou there is a series of five gates, a tower and two facing rows of towered gate pavilions. The large square adjoining the palace is T-shaped and there is a rudimentary ambulatory, all new features of the Song Kaifeng layout. These new features would almost all influence later generations for some time to come and so Kaifeng can be described as having significance as a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layout in the latter period of Chinese feudal society.

KEY WORDS:

Dongjing Kaifeng fu; outer city; inner city; palace city; imperial city; palace square; ambulatory; main roads; roads, markets; four rivers flowing through the city; outline; layout; functional areas.

前言

北宋沿五代晋、汉、周旧制设四京,以开封府为东京、河南府(洛阳)为西京、应天府(商丘)为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为北京¹,建都于东京开封府。北宋东京开封府城,承袭了后周开封城外城、内城、宫城三城环套的总体布局,并在此基础上规划新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改建和增筑措施。因而北宋开封府城既保持了城市发展的延续性,又突出了新都的特点,形成了新的布局体系。其建制沿革如下。

开封是座历史名城,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和金代后期均建都于此,故有“七朝都会”之誉,并与西安、洛阳、北京、南京、杭州、安阳合称为中国七大古都。开封历史悠久,建置和城建沿革复杂,其演变情况与北宋东京城关系密切²。

开封位于黄河冲击平原西部边缘,地处华北平原与黄淮平原交接地带,北距黄河约9.1公里,地势平坦,平均海拔约70米。这里土层深厚,水道四达,古代时森林茂盛,盐碱不盛,自然地理条件较好,因而成为历代建城立都之所。开封城肇始的时代上限,最早

有据可查者,是春秋郑庄公(前743—前701)时期所筑的启封城(“启拓封疆”之义),该城故址在开封城南约25公里,开封县朱仙镇东南3公里的古城村(经1986—1987年考古调查勘探后,予以确认)。汉初因避景帝刘启讳,改启封为开封。此外,战国时期魏惠王于公元前361年将都城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到今开封城西北一带的大梁³,秦灭魏在大梁置浚仪县。东魏天平元年(534)在浚仪县置梁州,北周建德五年(576)改梁州为汴州(临汴水)。唐延和元年(712)开封县治移汴州城,建中二年(781)宣武军节度使治所从商丘迁汴州。五代时期后梁开平元年(907)改汴州为开封府,号东都,后唐灭梁又复为宣武军镇所,后晋天福三年(938)重置开封府,始称东京(以洛阳为西京),后汉和后周因之。960—1126年北宋建都开封,称东京开封府〔图一〕⁴。金占据开封后始称汴京,贞元元年(1153)改称南京,为金之陪都。金贞祐二年(1214)为蒙古军队所迫,将都城从燕京迁到南京。元军占领开封后设河南江北行中书省,省治开封,至元二十五年(1288)设汴梁路。明洪武元年(1368)攻占开封后,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号北京。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封其子朱橚为周王,开封又成为周王府治所。清代仍称开封府,1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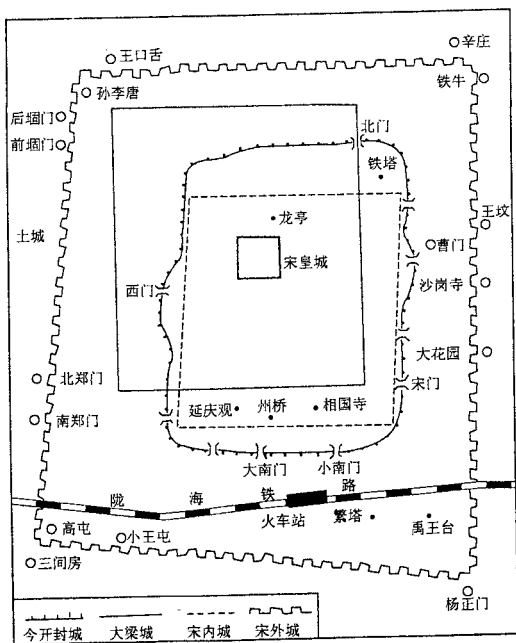
1 见《宋史·地理志一》西京、南京、北京条。本书对此三京不赘述。

2 参见开封市文物工作队编《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所收丘刚:《开封文物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刘顺安:《开封历史上的别名、城(遗)址及其特征》。

3 大梁城现埋于地下10米余,情况不明。学者们根据有关线索推测,大梁城东城墙仍在今开封城北门大街向南至卧龙街口,向北至大堤外。西城墙约从东陈庄向南与前述东城墙大致平行。北城墙约在今城墙外3—5公里左右一线。东门称夷门,约在今北门和铁塔公园一带。西门称高门,约在今城西5里的东陈庄一带。其面积略大于今城。参见前引《开封历史上的别名、城(遗)址及其特征》。按,魏惠王迁都又有前339年、前364年诸说。

4 北宋以开封为都,中国统一王朝的都城位置首次东移,究其原因,大致有六。其一,五代时期几个小王朝相继在开封建都,特别是后周对开封城进行了扩建、增筑和整修,为北宋在此建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二,赵匡胤曾任后周殿前都点检,熟悉当时的形势及当地的地理和民俗,利于统治。其三,赵匡胤以开封为基地发动陈桥兵变,开封是其发祥之地,也是其主要班底和实力之所在。其四,开封地控经济命

脉。南北朝之后江南经济迅速发展,财富仰仗于江南。尤其是隋唐以来,南北大运河的漕运成为历代的生命线。而开封控扼汴河,正处于这条生命线的心脏地带。其五,战略地位重要。开封北据燕赵,南通江淮,西峙嵩岳,东接青济,地处水路交通要冲,“居内控外,为天下枢”。故有人说:“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六“河南一”序)其六,统一大业之需要。北宋始建,为“平江表,破蜀都,下南越,未东吴,北定并汾,南取荆湘”(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二十《皇畿赋》),进而统一全国,立足于开封这个战略要地更显得十分重要。鉴于上述诸种原因,开封虽然地势坦荡,无险阻绝塞凭守,却仍以“国家之固,在德不在险”为由而在此建都。为弥补无险阻绝塞的缺欠,北宋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以兵为险”,在都城维持庞大的禁卫军守卫京师。二是大修外城,在城墙结构上出现许多利于守卫的新变化(详见正文)。但是应当指出,宋太祖对开封地势坦荡,无险阻绝塞凭守并不满意,所以他曾指出“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打算迁都洛阳,因遭群臣反对而作罢。



〔图一〕开封古今城垣位置示意图

年废府存开封县，为河南省省会。1948年置开封市，1954年省会迁郑州。

开封是国务院首批颁布的24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195处，其中国家级5处，省级17处，市、县级173处。但是，应当指出，北宋东京开封府城经多次兵燹、改建和黄河的淹灌，破坏严重，城内外的地形地貌变化很大，并被近现代的建筑叠压，所以考古工作十分困难。其正式的考古工作大都在1981年之后，经开封文物工作队的努力，

相继调查、试掘和勘测了北宋东京外城、内城、皇城三道城墙和城门，以及古州桥、明周王府、汴河、蔡河、金明池和御街等重要遗址，取得可喜的成果。下面拟结合这些成果，对北宋东京城的形制布局略作介绍。

第一节 外城的形制

一、沿革

外城始筑于后周，世宗时为解决诸卫军营和官署用地不足，工商业迅速发展而坊市、邸店有限，城内屋宇交连，街道狭窄，雨雪有泥泞之苦，风旱有火灾之忧，炎热相蒸有疾病之虞等问题¹，在显德二年（955）四月下诏“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又称外城、新城和国城）”。规定筑外城“先立标帜”，“今后凡有营葬及兴窑灶并草市，并须去标帜七里外。其标帜内，候官中劈画，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²，“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³。显德三年正月，发开封府及曹（今山东曹县）、滑（今河南滑县）、郑（今郑州）之民十余万筑罗城，踰年而成。城墙用虎牢关（今河南荥阳境内）土修筑（因开封土质松软），坚固如铁，周长48里233步⁴。显德五年五月，周世宗赐外城诸门额，东面二门称寅宾

1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十六《城郭》载显德二年四月诏，诏书中说：“惟王建国，实曰京师，度地居民，固有前则。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难。而又屋宇交连，街衢湫隘，入夏有暑湿之苦，居常多烟火之忧。将便公私，须广都邑。宜令所司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又《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二记载：“近建京都，人物喧阗，间巷隘陋，雨雪则有泥泞之患，风旱则多火烛之忧，每遇炎热相蒸，易生疾治。”

2 见前引《五代会要》卷二十六《城郭》载显德二年四月诏书。

3 《册府元龟》卷十四《帝王部·都邑》。

4 《旧五代史·周书·世宗本纪》：显德三年正月，“戊戌，发畿内及滑、郑、曹之丁夫十余万筑新罗城。”高承：《事物纪原》（惜阴轩丛书，十

卷）卷六“京城条”引宋敏求《东京记》：“周世宗显德二年四月，诏京城四面别筑罗城。二年正月，发京畿滑郑曹之民，命薛可言等四面督之，韩通总其事，王朴经度，凡通衢委巷广袤之间，皆朴定其制，踰年而成。”韩通时任曹州节度使，总体规划设计由开封府副留守王朴负责，参见《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王朴传》。城墙用虎牢关土为之，坚密如铁，受炮所击唯凹而已。”明人李濂：《汴京遗迹志》也有相同记载。外城周长，《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一、《宋史·地理志》和《玉海》卷一百七十四，皆记为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此外，高承：《事物纪原》卷六引《宋朝会要》，记为四十八里二百三十步；宋孟元老著，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年）引赵德麟：《侯鲭录》（知不足斋丛书本，八卷）卷三，记为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周长以前面《宋会要辑稿》、《宋史》等记载为是。

门、延春门；西面二门称迎秋门、肃政门；南面三门称朱明门、景风门、畏景门；北面三门称玄德门、长景门和爱景门¹。

北宋时外城亦称罗城、新城和国城。相传宋太祖初修外城，使城墙“曲而宛，如蚓蚘焉”，“及政和间，蔡京擅国”，则“一撤而方之如矩”²。或说外城“状如卧牛，保利门其首，宣化门其项”，“俗呼为卧牛城”³。对于无险阻绝塞凭守的东京开封府来说，“高墙深池”，不断加强外城防御功能是至关重要的，故北宋屡修外城⁴。早在太祖元年（968）就开始略修外城⁵，真宗和仁宗时增修外城各有两次（大中祥符元年、九年，天圣元年、嘉祐四年）、英宗时一次（治平元年）。到神宗熙宁八年至元丰元年（1075—1078）间则大规模整修外城，元丰元年十月完工后，李清臣撰文刻石于南薰门上。文中说：“以三岁之绩，易数百年因循之陋，崇墉迄然，周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横度之基五丈九尺，高度之四丈，而埤垝七尺，坚若埏埴，直若引绳（可见前说蔡京擅国“一撤而方之如矩”不确，城的形状也非卧牛状）。”⁶此外，修城毕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五记载：元丰元年十二月戊午，开封府请求于新城四壁内留10步“以

墙为卫，外容车马往来”。宋廷下诏，止以7步外筑墙，以所减3步，外加2步，共5步为路。可见城墙之内还有环城路。又同书卷三三六元年六月闰六月己卯条记载，在城墙内四拐角地带内空30步，30步内官私房屋一律拆除。元丰年间修外城重在“增卑培薄”，筑“楼橹以拟边疆（增强防御功能，筑瓮城、敌楼、战棚、马面等，到哲宗时陆续完成）”⁷。此后元丰年间又大举开濠修护龙河（护城河），直到绍圣元年（1094）才完工。宋徽宗时继而“度国之南展筑京城，移置官司军营”⁸，但在“楼橹尚未完备”之时，金人就南下灭宋。外城经多次整修后，《东京梦华录》卷一描述说：城墙“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头”，“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荫。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贮守御之器”，“城濠曰护龙河，阔十余丈。濠之内，外，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⁹。

外城经北宋整修后有城门12座，水门6座〔图二〕。南面三座城门，中间正门称南薰门，东为宣化门（陈州门）、西为安上门（戴楼门）。戴楼门东有蔡河上水门（广利水门），陈州门西有蔡河下水门（普济水门）。东面二座城门，南称朝阳门（新宋门），北称含辉门（新曹门）。新宋门南有汴河南北水门（北岸称通津门，

1 顾炎武：《历代宅京记》（中华书局，1984年），卷十六《开封》后周条。

2 岳珂：《程史》卷一“汴京故城”，中华书局，1981年。

3 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卷六六，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刻本；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一，“宋京城”，三怡堂丛书本。

4 参见孙新民：《略谈北宋东京外城的兴废》（收在前引《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文末附表：北宋时期东京外城修缮一览表。终宋一代，对外城进行十余次增修。刘迎春：《北宋东京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该书100—102页亦列外城修缮一览表（表3—1）。

5 《宋史》卷一《太祖本纪》：“开宝元年春正月甲午，增治京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开宝元年正月甲午，“发近甸丁夫增修京城，马步军副都头王廷义护其役”。按，此时重在修宫城，外城仅略加修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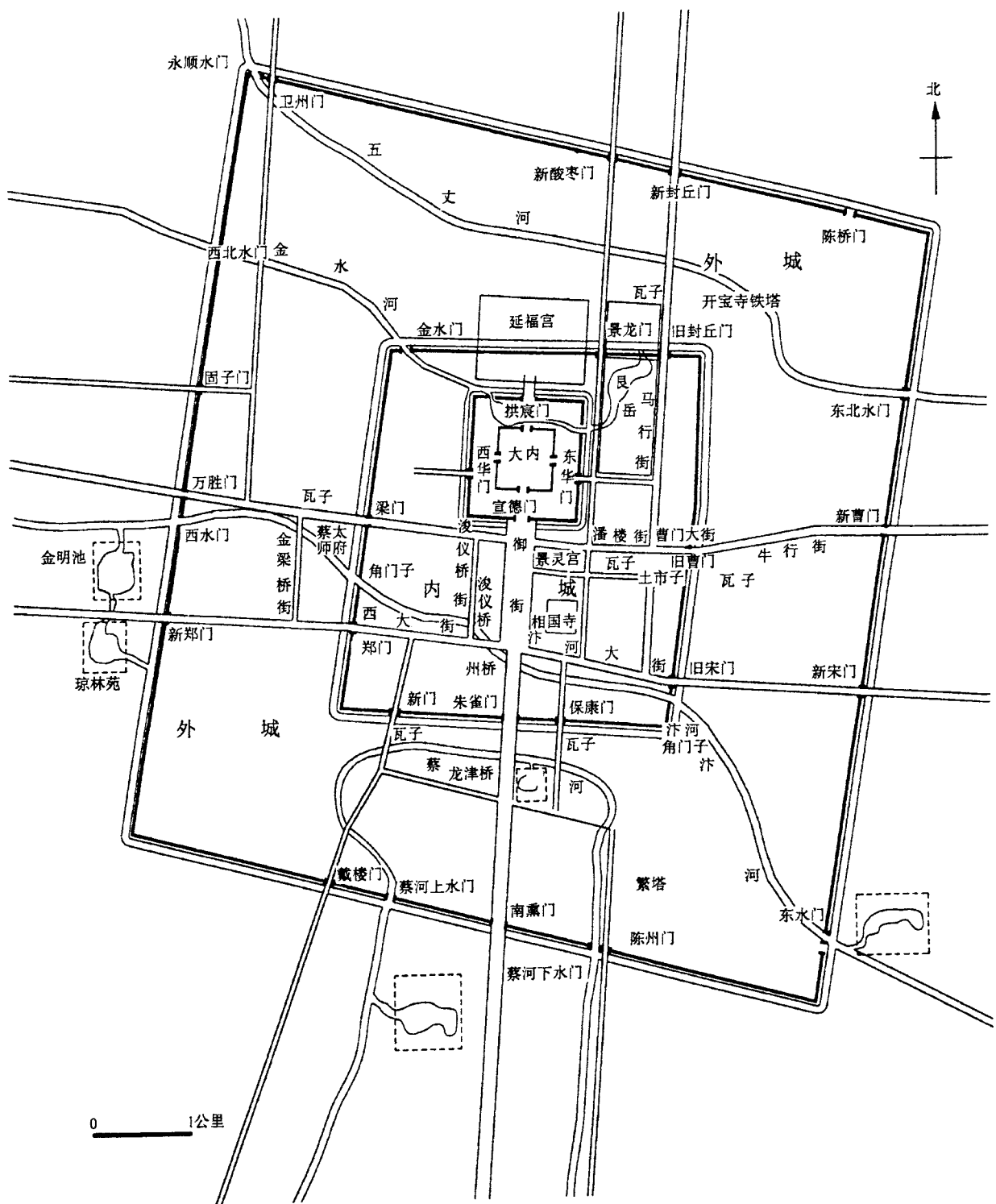
6 《东京记》：熙宁中“始四面为敌楼，作瓮城及浚濠堞也。”《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一五：八月二十一日诏：“都城久失修治，熙宁之初，虽尝设官完善，费工以数十万计，今遣人视之，乃颓圯如故。”九月七日，重修都城，诏内臣宋用臣董之，专拨军士5000余人隶其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三，元丰元年十月丁未条记载，诏知制诰直学士孙洙撰记，刻石于南薰门上。其记曰：“……城周五里百六十步，高四丈，广五丈九尺，外矩隍空十五步，内空十步。白熙宁八年九月癸酉兴工，以内侍宋用臣董其事，役募卒万人，创机轮以发十《续

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八记为“飞土梯，运土车”，财力皆不出于民。初度功五百七十九万有奇，至是，所省者十之三。”孙洙未完成撰记而死，由李清臣完成。《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二二至二三，载李清臣撰文，该文除前引者外，还有“兵不逾一万，分部者六，板幹递迁，畚鍤贯序，创机轮以登土，为铁疏以固沟，肇于丙方，环于四浹”之语。

7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二〇记载，徽宗时承议郎樊藻曾说：“元丰初，重修外城仅五十里，增卑培薄，屹然崇墉，遗国家万世之业，顾不伟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八，熙宁八年九月丙寅，记蔡承禧说：修外城筑“楼橹以拟边疆”。《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十八、十九记载：元丰七年在城外辟城壕，并“贾木修置京城四御门及诸瓮城门，封筑团敌马面”。

8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二〇；《宋史·地理志》。

9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三之一九：“真宗景德二年四月，改修京城新城诸门外桥并增高之，欲通外濠舟楫使入故也。”可知宋初外城有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十一，元丰五年十二月甲子，宋廷诏：“在京新城四壁城濠，开阔五十步、下收四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泉止。”元丰七年正式开工，至绍圣元年，前后十五年才最后完工，为宋代最大工役之一，城高濠阔为当时全国诸城之冠。然城濠最终挖成，不是阔五十步，而是阔十丈余。



〔图二〕北宋东京城平面示意图

南岸称上善门, 又称东水门), 新曹门北有东北水门(广济河水门, 善利水门)。西面三门, 中间称开远门(万胜门)、北为金耀门(固子门), 南为顺天门(新郑门)。万胜门南有汴河西水门(水门北岸有宣泽门, 南岸有大通门), 固子门北有金水河水门(西北水门)。北面四门, 东为景阳门(陈桥门), 其西依次为永泰门(新封丘门)、通天门(新酸枣门)、安肃门(卫州门), 前述括弧内的陈州门等乃宋初因周时俗称, 城门正门名称主要改于太平兴国四年(979), 天圣初年又改动一次, 水门皆太平兴国四年赐名¹。城门诸俗称, 大都以城门交通联系的主要地点为名。它们分别通往陈州(今河南淮阳)、宋州(今河南商丘)、曹州(今山东菏泽南)、万胜镇(今河南中牟东北)、郑州(今郑州)、陈桥镇(今河南封丘县陈桥)、封丘(今河南封丘)、酸枣(今河南延津旧酸枣县)、卫州(今河南汲县)等。诸“城门皆瓮城三层, 屈曲开门。唯南薰门、新郑门、新宋门、封丘门, 皆直门两重。盖此系四正门, 皆留御路故也”²。诸城门有严格的管理制度³。

北宋末金人攻开封城, “四城楼橹皆被焚烧”⁴, 外城遭到极大破坏, 金正大四年(1227)疏浚了外城护城壕。此后, 在金元攻守战中, 外城再遭破坏。元末“尽毁天下城隍, 开封城亦仅余土阜”⁵。总之, 入金历元, 开封“外城毁而内城存”⁶。明代时外城“仅余基址, 有门不修, 以土填塞, 备防河患”⁷, 将北宋外城作为土堤阻拦河水。明末农民起义军攻开封

城, “铲土城(指外城墙)至尽”⁸。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黄河决口, 外城残垣俱淹没于地下。

二、外城的形状与外城墙的调查和试掘〔图三〕

1978年秋, 开封市博物馆对外城进行了初步调查。1981—1983年,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开封市博物馆共同组成“开封宋城考古队”, 对外城进行勘探和重点试掘, 基本了解了外城的位置、形状和范围⁹。据此可知, 外城方向190度, 平面呈东西略短, 南北稍长的长方形, 周长29180米, 与文献记载宋开封外城周长“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基本相近(一宋里约合559.872米)¹⁰。外城墙大体呈直线, 东和西城墙中段稍内弧, 南半部城墙保存略好, 北部城墙临近黄河, 愈北破坏愈严重。四面城墙与今开封市现存明清城墙大致平行, 两者东城墙相距最近, 约1.4公里, 两者西城墙相距最远, 约2公里。

东城墙基本呈直线, 中段稍内弧。城墙南端在驻军某部院内, 向北经文庄、大花园村、小巴屯村、铁牛村西, 止于辛庄东北, 全长7660米。全线除4处共2200米地段被现代建筑叠压或为流沙层而无法勘探外, 其余地段均在地表下深约0.5—5米间探到城墙夯土, 墙体宽10—20米。

南城墙大致呈直线, 自东向西经药厂、烟厂、郭屯村、蔡屯村南、高屯村南, 止于预制构件厂西墙外, 全长约6990米。南城墙大部分被现代建筑叠压, 其

1 参见前引《东京梦华录注》卷一“东都外城”, 22页(二)城门引周城《宋东京考》一。前引《略谈北宋东京外城的兴废》。

2 前引《东京梦华录注》卷一“东都外城”。

3 前引《北宋东京城研究》106—108页记述, 城门严格控制启、闭的钥匙, 按时启闭城门, 严格出入城门登记制度等城门管理制度。

4 前引《三朝北盟汇编》卷七十, 靖康六年闰十一月三日。

5 前引《读史方輿记要》引《城邑考》。

6 《光绪祥符县志》, 建置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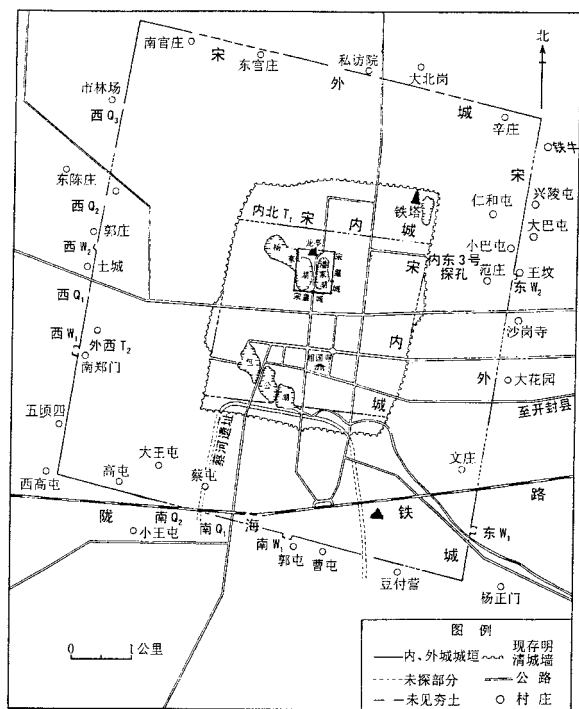
7 《如梦录》, “城池纪第一”,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4年。

8 周在浚:《大梁守城记》。

9 丘刚、孙新民:《北宋东京外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文物》, 1992年12月12期。丘刚:《北宋东京外城的城墙和城门》,《中原文

物》, 1986年4期。孙新民:《略谈北宋东京外城的兴废》,《华夏考古》, 1994年1期。丘刚:《北宋东京三城的营建和发展》,《中原文物》, 1990年4期。外城情况主要据上述诸文进行介绍。

10 前引《北宋东京外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说:“一般认为宋1里约合559.872米。”据此29180米则合52宋里。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 1993年), 66页记载宋一尺合30.72厘米, 是一步合153.6厘米, 一里合552.96米, 据此29180米约合52.7宋里。此外, 考古测量外城周长约29180米, 文献记载外城周长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 约合50.4583宋里(165步÷360步=0.4583里), 是一宋里约合578.29米(29180米÷50.483里)。这个结果大于上面标准, 与后面内城换算结果亦有较大差距, 所以下面仍用一宋里=559.872米(宋太府尺=31.104厘米)进行换算。



〔图3〕北宋东京城实测平面图

中除东起 650—1000 米、1550—1650 米两处是厂区和
水坑无法勘探外，余者皆在地表下 1—8 米间探到
城墙夯土，墙体宽一般为 10—20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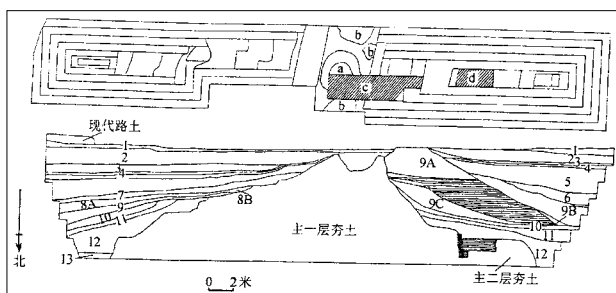
北城墙多次被黄河灌淹，破坏严重，仅断续勘探
约 5500 米。北城墙略呈直线，自东向西经大北岗村、
私访院村、东官庄和南官庄，全长 6940 米，墙体宽
15 米左右。

西城墙基本呈直线，中段稍内弧。城墙南起建筑
公司预制构件厂西墙外，向北经五顷四村，南郑门口
村、土城村、固门村，北至市林场护城堤处，全长
约 7590 米。西城墙除土城村偏北及前固门村偏北两
段地表下 4 米处为流沙层外，余者皆在地表下 0.2—
3 米间探到城墙夯土，墙体宽一般为 10—20 米。此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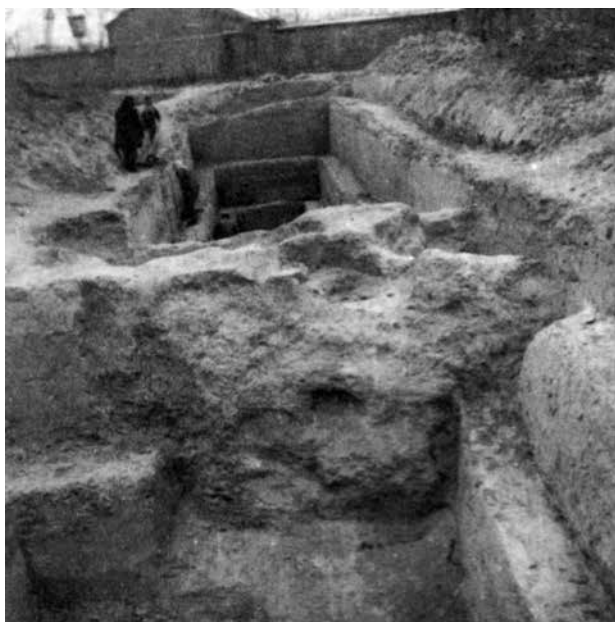
在城西南角及开封市林场院内两段城墙宽达 24 米（疑
为马面，其结构待查）。西城墙在四面城墙中保存相
对较好，故在西城墙南段开一条探沟 T1，东西 46、
南北 5—8 米〔图四〕，以了解城墙的结构。根据对
探沟的解剖情况，可知城墙基宽 34.2 米，残高 8.7 米，
顶部残宽 4 米，顶部破坏严重，发现一个圆形土井和
3 个土坑¹〔图五〕，墙体上窄下宽剖面呈梯形。城墙
以红褐色土为主，夯筑，夯层厚 8—12 厘米（一般
厚 10 厘米）〔图六〕，夯窝圆形，直径 4—5 厘米，
深约 1 厘米，夯窝很少叠压〔图七〕。在部分夯层内
发现一种半球形夯窝，直径 7 厘米，深 3 厘米，是边
填土边夯打形成的。此外，在夯层间均垫一层厚 2—
4 厘米，含灰、白、红颗粒状的灰褐黏土。墙体由三
部分构成〔图八〕，内侧（东，主 1 层）宽约 19 米为
城墙主体，夯土红褐色，黏性较大，夯层底部黏土分
布不匀，夯窝较疏散。夯土中所出瓷片以粗白瓷最多，
次为越窑青瓷和影青瓷。城墙主体外侧（西）为增筑
部分（主 2 层），宽约 8 米余，叠压东部夯土。该部
分的夯土稍泛灰色，内含少量细沙较松散，夯窝排列
整齐，夯层间均匀铺垫黏土。夯土中山越窑、临汝窑、
龙泉窑和影青瓷等瓷片。最外侧（最西边，主 3 层）
为补筑部分，宽约 6 米，残高约 2 米余，夯土红褐泛
黄，土质较软，夯窝稀疏，夯层间不垫黏土。夯土中
出砖瓦、越窑青瓷和定窑白瓷等瓷片，并出土“天圣
元宝”2 枚，“治平元宝”1 枚。前述三部分根据其夯
土质地、夯筑方法、夯层厚度和包含物的不同，推
测内侧城墙主体部分似筑于后周始建外城的显德年
间；外侧贴筑于内侧墙体的增筑部分，土质与前者略
有差异，夯筑方法相近，似筑于宋真宗时期（998—
1022）；最外侧补筑的夯土与前两部分差异较大，夯

1 周密：《癸辛杂识》记载：“汴之外城，周世宗时所筑，宋神宗又
展拓之，其高际天，坚壮雄伟。”《武经总要》前集卷一二“守城”条记载：

“筑城之法，每下阔一丈，上收四尺。凡城高五尺，底阔五丈，上收二丈，
尤坚固矣。”按此比例估算，外城高当在 3.42 丈左右，约合 10.63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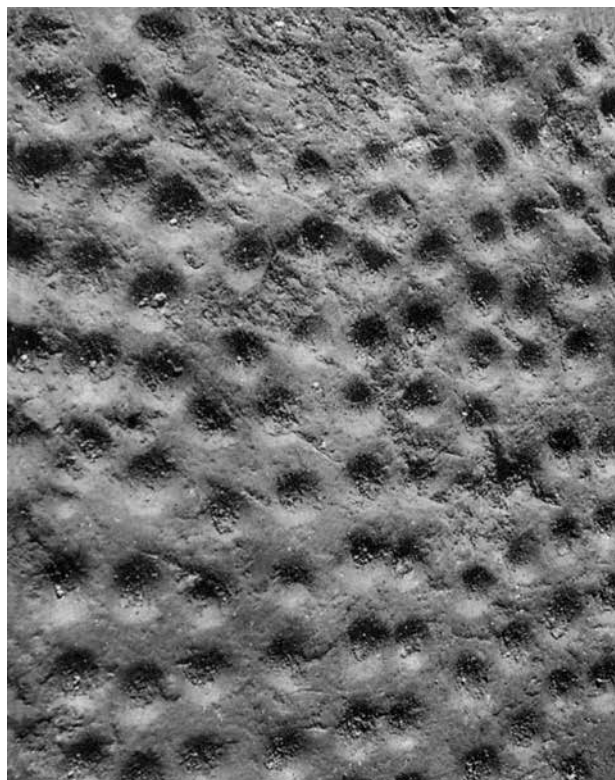
〔图四〕北宋东京外城西城墙T1南壁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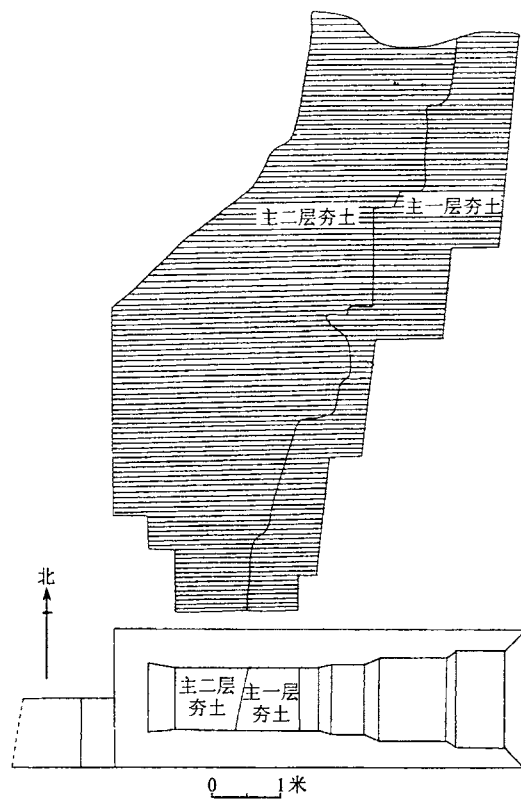
〔图五〕外城西城墙T1城墙顶部



〔图六〕外城西城墙T1城墙夯层



〔图七〕外城西城墙T1夯窝



〔图八〕外城西城墙T1解剖沟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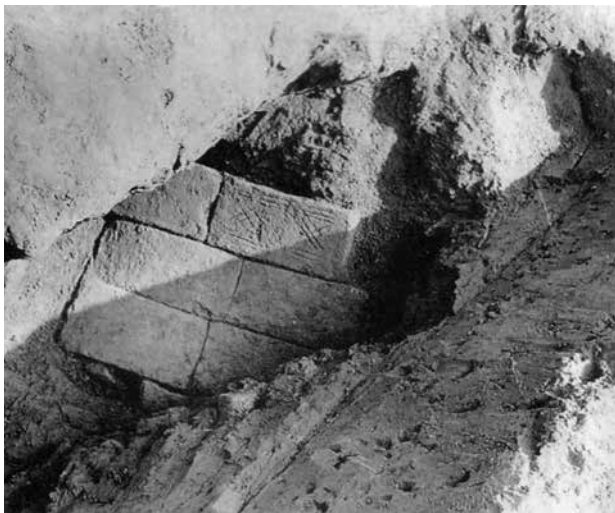
筑方法有别,似筑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至元丰元年(1078)左右。城墙夯筑的红褐色土与墙基下生土相同,当取自附近,作为“粘合剂”的黏土,或如文献所记取自虎牢关。此外,在主体城墙外侧增筑部分(主2层)下端西侧,压在最外侧补筑夯土(主3层)之上有砖砌下水槽遗迹〔图九〕。水槽为城墙排水设施,残存上、下两段,上段残高0.6米,下段残高1.2米,宽均为0.4米,下段较上段略偏东北0.1米(或与减缓水的下冲力有关)。水槽底砖平铺,两壁侧砖稍内斜。砖为宋砖,砖 $35\times 17\times 6$ 厘米,砖面有“X”形纹饰,砖间用泥沟缝。

探沟(T1)在城墙两侧的堆积有12—13层、厚10—13米左右(图四)。以内侧(东)堆积为例,第1层为耕土,2—6层为淤积层,仅出清代钱币等个别遗物。7—10层为明代堆积,其中第8层堆积又分为红色黏土(A)和黄褐色沙土两层,出宋代砖瓦和明代瓷片,疑是明末水淹开封时的堆积。第9层为黄色沙石层,土质较硬,出宋砖、宋钱,明代瓷片和明代钱币。但其外侧(西)第9层堆积为黄褐色土层,其下部发现23层夯土,土质较硬。从伴出有明代瓷片来看,发掘者认为应是明代依宋外城垣夯筑土堤的残留(拦阻洪水备防河患)。11—13层为宋代堆积,内侧距地表近11米,外侧距地表深约8米时始见宋代文化层。

三、外城门和水门的考古调查与试掘〔图三〕

(一) 西城墙的城门和水门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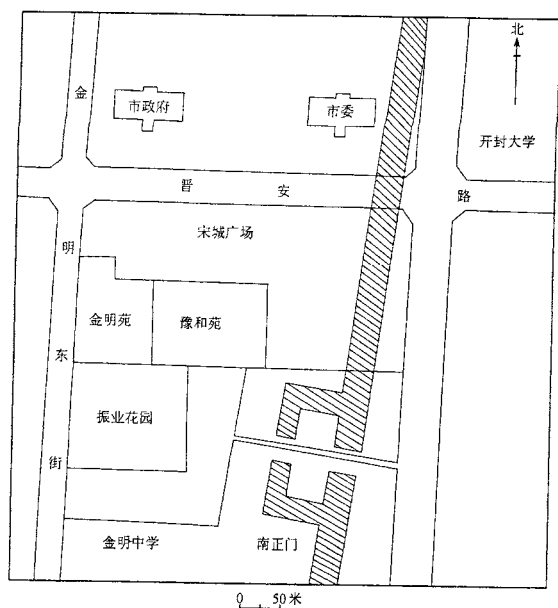
据调查在南郑门口村北侧有瓮城遗迹(W1),瓮城南距西城墙南端2050米,平西呈长方形,南北长165米,东西宽120米,中间开门(门宽不明),瓮城墙宽10—20米。瓮城内的城门与瓮城门东西相对,城门宽约30米,城门遗迹距地表深0.2—2米左右,属“直门两重”类型〔图十、十一〕。为进一步了解



〔图九〕外城西城墙 T1 水槽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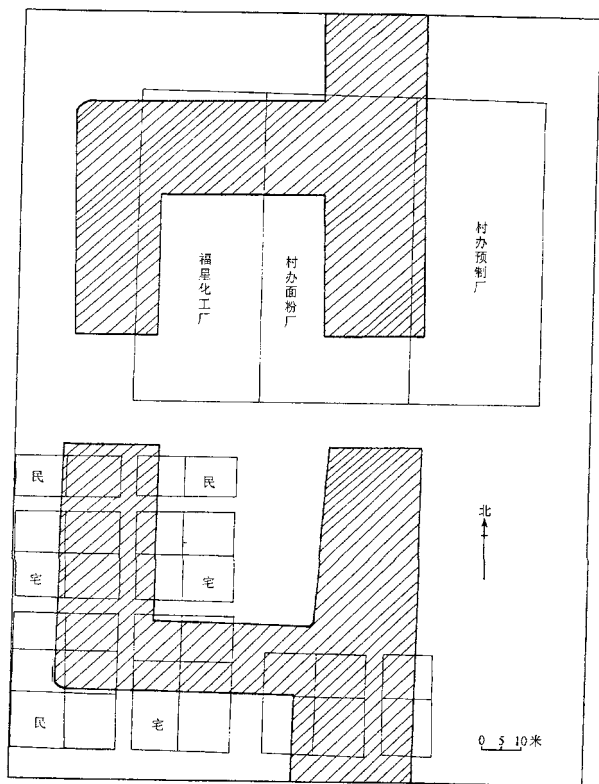
瓮城情况,在瓮城门北端与瓮城墙之间开一条探沟(T2,南北25,东西5米)。在地表以下4米左右发现一条东西向路面,坚硬的路土呈青灰色。在路面上发现三条车辙痕迹,车辙宽0.1米左右,车辙间距约0.75米。路土中出明代或更早些的瓷片,估计是明代路土。在该路土下有一层厚约0.8米的砖瓦堆积,砖瓦及所出瓷片均属宋和唐五代时期,似为城门倒塌后的堆积。在距地表深5.7米发现厚约1.1米的灰褐色宋代路面,路土中出宋代龙泉窑、钧窑、临汝窑、磁州窑瓷片,影青瓷片,以及少量唐五代时期的越窑瓷片。该瓮城遗址是已发现的诸门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据考证为顺天门(后周曰迎秋、太平兴国四年改名顺天,俗名新郑门)遗址。

在西城墙土城村北,南距顺天门遗址1680米发现一瓮城遗址(W2)。瓮城平面呈半圆形,南北向105米,东西向60米,门偏开朝北(“屈曲开门”),宽19米。瓮城内的城门宽约40米〔图十二〕,距地表深4米发现路土。路土坚硬呈黑灰色,内含沙礞石、碎砖和明代瓷片(明代曾利用此门),推测为开远门(太平兴国四年赐名通远,天圣后改名开远,俗名万胜门,后周无此门)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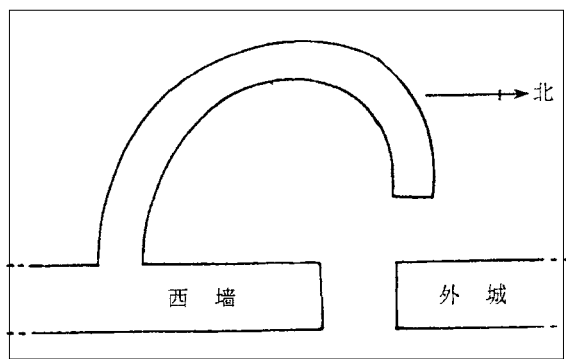


〔图十〕新郑门遗址位置图

2003年3月下旬,配合河南大学新校区工程,在新校区东北部,南距新郑门遗址3340米,距万胜门遗址120米处,探明固子门遗址¹。固子门城门缺口长方形,南北长32米,东西宽19米。城门缺口之西为瓮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79米,东西宽45米,瓮城拐角抹角。瓮城门二座,一在南墙近西端处,门长方形,东西长15米,南北宽10米,另一座在西墙近北端处,门呈长方形,规模同南瓮城门〔图十三〕。瓮城墙体宽约9米,结构同西城墙。在瓮城内发现两条道路遗址,路土距现地表深约11米,层厚约0.2—0.3米,为分别连接固子门与前述两座瓮城门的道路。又在瓮城内西南部发现一处用火遗址。此外,在固子门缺口处距现地表深8—11米的文化层中,发现大量碎砖瓦等堆积,在两瓮城缺口距现地表10—11.3米文化层中,同样发现大量碎砖瓦堆积。上述现象似乎表明墙体或已包砖,城门之上似有门楼建筑。固子门



〔图十一〕新郑门遗址实测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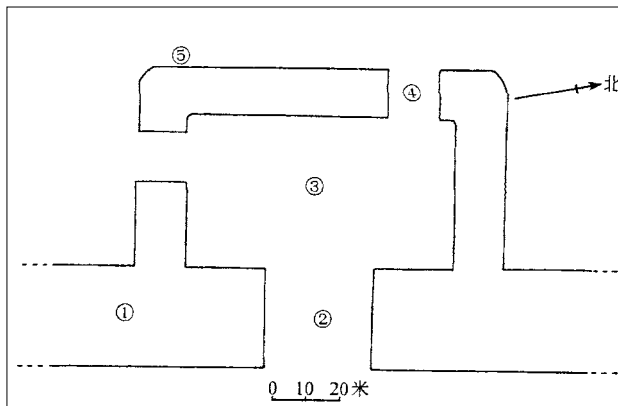


〔图十二〕万胜门遗址实测平面图

瓮城的形制,是一座与其他城门瓮城不同的新类型。

在土城村南,南距顺天门遗址910米发现一门址(Q1),平面呈对称的曲尺形,水门缺口宽约25米。曲尺形向外突出部分的顶部残缺,上端残宽约7米,下端宽约35米,推测是汴河上水门(西水门)遗址〔图

1 前引《北宋东京城研究》139—14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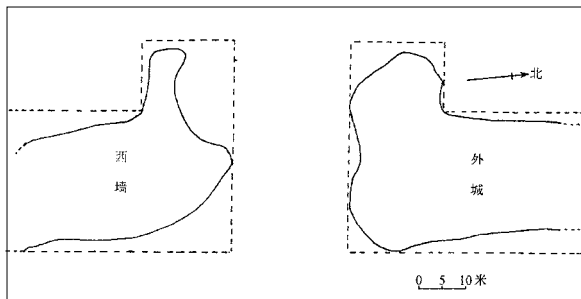
〔图十三〕固子门遗址实测平面图及探孔位置示意图

十四〕。在固门村西南，南距开远门遗址 620 米发现一门址(Q2)，缺口宽约 65 米，因地下水位高无法勘探，其性质尚待进一步考古工作和深入研究方可断定。在开封市西郊林场内，南距金耀门遗址 1520 米发现一门址 (Q3)。门址缺口宽约 35 米，缺口北侧有向外突出的长方形残迹，推测是金水河水门（太平兴国四年赐名咸丰水门）遗址〔图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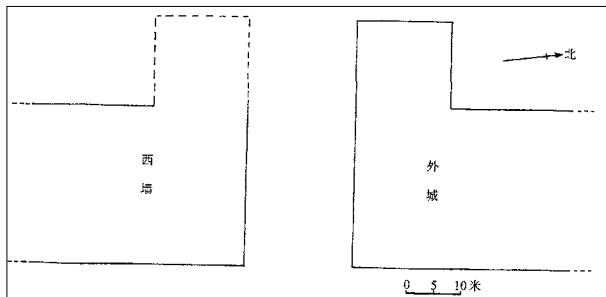
（二）东城墙的城门和水门遗址

东城墙南端向北 5020 米，在开封市二商干校院内发现一瓮城遗址 (W2)，距地表深 3.7—6.7 米探到瓮城夯土，瓮城平面呈半圆形，东西向 50 米，南北向 108 米，墙宽约 15 米，推测为含辉门（周曰寅宾，太平兴国四年改名含辉，俗名新曹门）遗址〔图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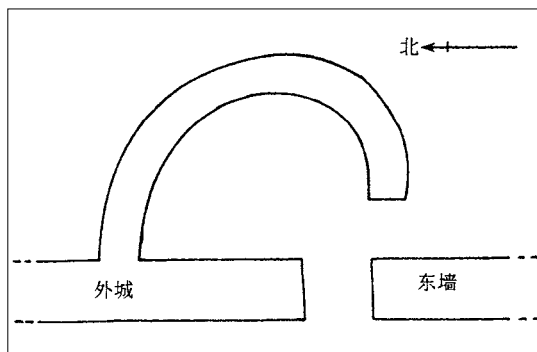
东城墙南端向北 730 米（开封市火葬场西侧），发现城墙缺口，南北宽 35 米。在其外侧今火葬场大门两侧又钻探发现一形如瓮城的遗址(W1)。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130 米，东西宽 100 米，墙厚 20—28 米。距地表深 4.5—8 米探到门址夯土，瓮城门开在中部与城墙缺口相对，两者宽均为 35 米左右。推测城墙缺口为汴河东水门（汴河下水门），而其外的形如瓮城者则



〔图十四〕汴河西水门实测平面示意图



〔图十五〕咸丰水门遗址实测平面示意图



〔图十六〕新曹门遗址实测平面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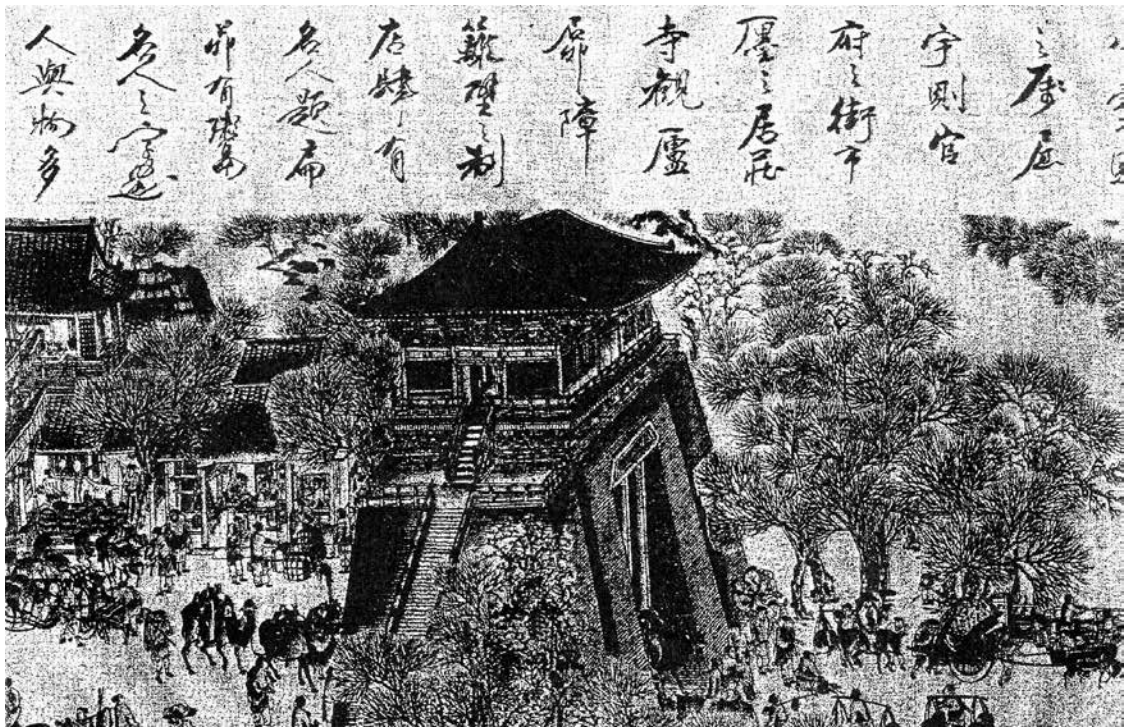
似为捍御汴河水门的拐子城遗址〔图十七〕¹。

（三）南和北城墙的城门和水门遗址

在距南城墙东端 2900 米处发现瓮城遗址 (W1)，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130 米，南北宽 80 米，墙厚约 15 米，中部开门，宽 35 米，门道情况不明，与瓮城门相对的外城门尚未找到。该门址与今开封市南北中轴线（中山路）相对，推测为南薰门（周曰景风，

1 前引《东京梦华录注》卷一，“东都外城”：外城“东南曰东水门，乃汴河下水门也。其门跨河有铁裹窗门，遇夜如闸垂下水面。两岸

各有门，通人行路。出拐子城，夹岸百余丈”。



〔图十九〕《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门

内城的基础，并成为今日开封城之雏形。五代时期，仅后周时略经修缮，入宋后又多次修筑后有十座城门、二座角门子¹。即南面三门，中间正门称朱雀门（唐曰尉氏，梁改名高明，晋称薰风，宋太平兴国四年改为朱雀），东为保康门（大中祥符五年建并赐名），西为崇明门（周曰兴礼，太平兴国四年改称崇明，俗名新门）；东面二门，南为丽景门（唐曰宋门，梁改观化，晋改仁和，太平兴国四年又改称丽景，俗名宋门），北为望春门（唐曰曹门，梁改建阳、晋改迎初，宋初称和政，太平兴国四年改名望春，俗名曹门）；西面二门，南为宜秋门（唐曰郑门，梁改开明，晋改金义，太平兴国四年改名宜秋，俗名郑门），北为阊阖门（唐曰梁门，梁改乾象，晋改乾明，宋初称千秋，

太平兴国四年改名阊阖）；北面三门，正中为景龙门（唐曰酸枣，梁改兴和，晋改玄化，太平兴国四年改名景龙，俗名酸枣），东为安远门（唐曰封丘，梁改含辉，晋改宣阳，太平兴国四年改名安远，俗名封丘），西为天波门（梁曰大安，太平兴国四年改名天波，俗名金水门）。此外，还有两座角门子，即东面丽景门汴河南岸角门子，西面宜秋门北汴河北岸角门子。除上所述，北宋还开凿了内城的护城河，经广济河（五丈河）内、外城的护城河可以相通（内城南濠缺乏记载，故内城是否有完整的护城河尚有疑问）²。

金兵攻破开封，内城遭严重破坏。此后，金代末期金廷定都开封期间（1214—1233）曾扩展内城，北宋内城基本被毁³。元灭金，开封更名汴梁。元末为

1 《宋会要辑稿·方域》之一二〇记载：北宋对内城屡有贴补和增筑，但具体情况不详。仅《玉海》卷一七四记载皇祐元年（1049）八月十三日“葺旧城”；《宋会要辑稿·方域》之一四记载：嘉祐四年（1059）十月十六日，“命内侍供奉官王希古贴筑在京新旧城墙。”

2 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46—47

页论证里城北、西、东均有城濠，“里城南濠，缺乏记载”。其结论是“里城有护城濠，但不能证明已形成一个完整的环形城濠”。后有说以蔡河为内城南护城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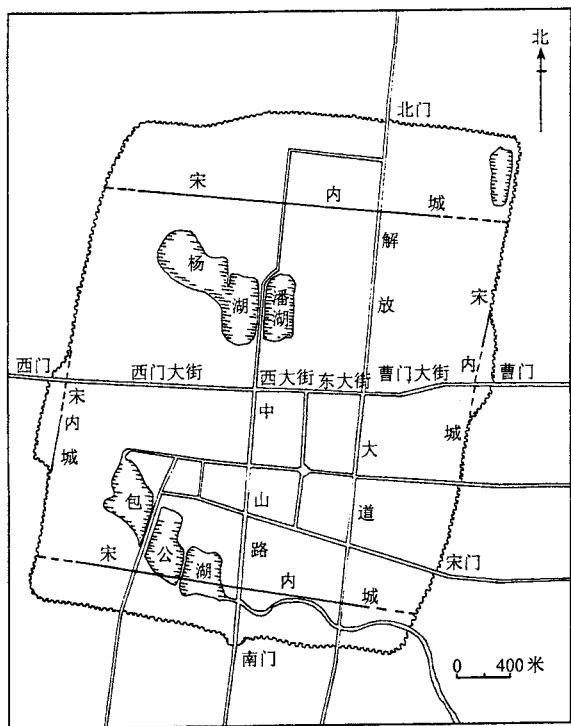
3 金迁都开封后修城，将原宋内城南、北城墙铲平向外各扩约半里，东西墙仍北宋旧墙，仅稍加高修整而已。

防红巾军，塞八门，仅余五座城门（至今未变）。明初在金代开封城基础上重筑开封城，城门五座，城墙始包青砖。至明末开封城周二十里一百九十步，高五丈，崇祯十五年(1642)内城被大水淹没。清康熙元年(1662)在明城基础上重筑，城墙城门沿袭明代。道光二十一年(1841)黄河决口灌开封城，第二年又重修开封城墙，周长二十八里许（经实测今开封城周长 14.4 公里）¹。

二、内城的形状与内城墙和城门的调查试掘²

根据考古勘探，宋代东京内城南城墙在今大南门北 300 米左右的東西一线，北城墙在龙亭大殿北 500 米左右的東西一线，东、西城墙被叠压在明清東西砖城墙之下。内城大致位于外城内的中间〔图二十〕，方向 190 度，形制略呈方形（東西稍长），四面城墙总长约 11550 米，约合宋里 20.63 里（宋一里为 559.872 米）³，与文献所记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大致相合（规模与唐汴州城同），规模小于现存的明清开封城。

北宋东京内城遗址埋藏深（距地表 8—10 米），地下水位高（部分地区距地表 0.8 米即见水），淤沙堆积厚（仅明清两代淤沙堆积厚就达 5—6 米），所以内城考古勘探和试掘十分困难。自 1986 年以来，仅探明内城的位置、范围和部分门址。其中东城墙在明清东城墙新开城门缺口处勘查，可知宋内城东城墙被压在明清东城墙下，其顶端距地表约 3.6 米，城墙夯筑、夯层清楚，土质黄褐色，坚硬细密，下部因长期水浸无法勘探。宋内城西城墙的勘探，多在明清西城墙新开的城门或其突出部位内侧进行，可知内城西城墙大部分被压在明清西城墙下，内城墙顶端距地表约 3 米，残高约 8.2 米（宽度无法测量），夯筑，夯



〔图二十〕北宋东京内城与今开封城位置关系示意图

层清楚，城墙底部基础垫 30 厘米厚的砖瓦层。2000 年 7 月在开封城墙西门北侧古马道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现地面上为高 8 米的今修复的城墙，地表以下 3 米见明清西城墙。地表以下 3—11 米为北宋内城西城墙，再下 11—11.4 米见唐汴州城西城墙基础。地表下 3—11 米宋内城西城墙上层墙体内侧见宋代小型青砖（24×12×6 厘米）包砌，下层钻探部位仅见夯土，未见包砖，下层底部有一层厚约 20 厘米的砖瓦层。该层之下探出一层夯土，厚 10—15 厘米，其下有厚约 25—30 厘米的砖瓦层，再下即生土层，此为唐汴州城西城墙的基础部分⁴。东京内城东、西城墙长度，目前尚无法准确测定。宋东京内城南城墙在开封市三

1 1996 年 12 月，开封城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丘刚：《北宋东京内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文物》，1996 年 5 期。前引《北宋东京三城的营建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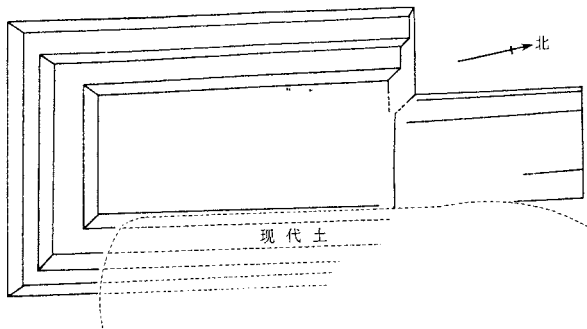
3 考古调查推算内城周长约 11550 米，文献记载内城周长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即 20.43 宋里（155 步÷360 步=0.43 里），是一宋里

合 565.34 米（11550 米÷20.43 里）。此数据略小前面外城换算一宋里=578.29 米，但仍大于一宋里=559.872 米。由于 20.63 宋里与 20.43 宋里仅差 0.2 宋里，说明内城考古调查推算的周长较近似于文献所记内城周长。

4 前引《北宋东京城研究》169—170 页。

建预制厂向东经迎宾饭店、包府坑东湖、封吉府街、南泰山庙街、青龙背街至汽车发动机厂一线，已探明的地段约 2100 米。南城墙破坏严重，残墙基高 0.6 — 1.8 米，残宽 3 — 10 米，距地表一般在 8 米以下，最深达 9.8 米。宋东京内城北城墙在开封市汽车公司停车场向东经塑料公司、文昌街小学、市人民体育场南部、汽车四队、二十八中等一线。北城墙破坏最为严重，现已探明地段长仅 1400 米左右。从已探明部分看，内城北城墙的部分地段与金皇宫北墙、明周王府萧墙北墙相叠压，两侧向外延伸的地段距地表深 8.5 — 9.5 米，内城墙残高 0.5 — 1.2 米，残宽不足 5 米。宋东京内城南、北城墙的毁坏，推测是金宣宗定都开封时向南、北扩展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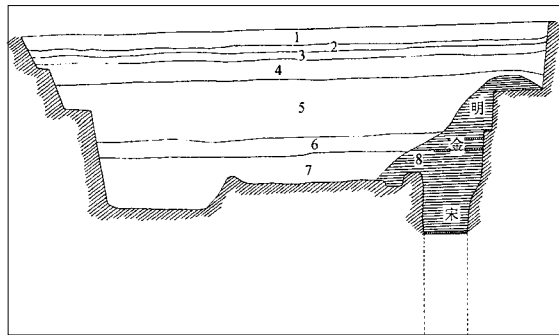
在调查勘探的基础上，选择内城北城墙西段开一南北向探方（内北 T1，南北 18.5，东西 8.85 米）〔图二十一、二十二〕。据此可知北宋内城北城墙上面分别筑有金皇宫北墙和明周王府萧墙北墙。明周王府萧墙北墙在探方北部第 5 层文化层下，距地表 1.9 — 4.15 米，墙厚 2.25 米。棕褐色和灰褐色两种土质夯筑，夯层厚 10 — 20 厘米，质地坚硬。夯面夯窝密布，夯窝圆形浅平底，直径 3 — 5 厘米，深 0.5 — 1 厘米。夯土包含物有明影青瓷片、白釉瓷片、宋临汝窑印花瓷片、钧窑瓷，以及布纹和绳纹陶片等。城墙底部铺砖瓦层厚 5 厘米，砖层自东向西交错顺平铺四排，其间杂有绳纹、素面砖块、布纹瓦片和大量白灰。明



〔图二十一〕北宋东京内城北城墙 T1 平面图

周王府萧墙下压金皇宫北墙，金皇宫北墙距地表 4.15 — 4.45 米，厚 0.3 米，夯筑。夯土灰褐色，土质较松软，夯层夯窝不明显。城墙底部铺垫一层厚约 5 厘米的残青砖层。墙内包含物有宋白釉瓷片、临汝窑瓷片、绿釉及黑釉瓷片，唐民窑白釉瓷片、粗布纹瓦片和灰色带花陶片等。金皇宫北墙下压宋内城北城墙，宋内城北城墙距地表 4.45 — 7.32 米，厚 2.87 米，灰褐色土夯筑，土质较纯，坚硬细密。夯层一般厚 14 厘米，夯窝圆底，直径 6 — 7 厘米，深约 1 厘米〔图二十三〕。夯层底部垫厚约 16 厘米的砖瓦层（素面布纹黑板瓦、绿釉红胎布纹黑筒瓦和碎砖块等），墙内包含物均属宋或宋代之前，如宋白釉瓷片、影青瓷片、临汝窑及汝窑瓷片，唐白釉、黄釉、青釉瓷片，以及绳纹瓦片、布纹筒瓦和绿釉红胎琉璃瓦片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宋内城砖瓦层下还有灰褐色夯土层，探铲探至距地表 9.5 米深仍为夯土层（再下已无法钻探）。以此结合明清东西城墙下的宋内城东西城墙，利用钻机勘探到距地表深 11.4 米，其下部也是一层厚约 40 厘米的砖瓦层，砖瓦层下是生土层来看，宋内城北城墙砖瓦层下的夯土层有可能是唐汴州城北城墙遗迹。但是确否，尚待将来考古发掘加以验证。

北宋东京内城八座城门和二座水河，目前只有朱雀门和汴河西角门子遗址大致可定。朱雀门为内城正南门，在今开封城墙南门北约 350 米的中山路两侧，探明一宽约 90 米的城墙缺口，在缺口西南角距今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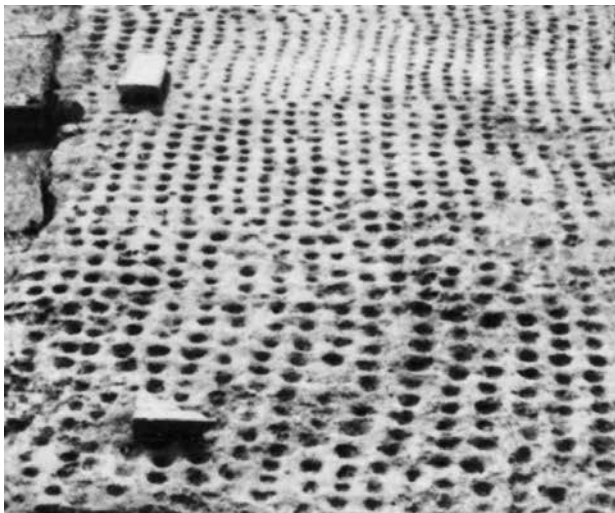


〔图二十二〕北宋东京内城北城墙 T1 西壁剖面图

表深 8.2 — 9.4 米处探到城墙夯土遗址, 此即与已探明的南薰门、州桥、宋皇宫遗址南北相对的朱雀门遗址。由于在缺口西北部距地表深 7.6 — 8.7 米处, 普遍探到大量碎砖瓦、瓷片和白灰等物, 推测应为朱雀门上建筑倒塌后的残迹。又在南距明清城墙西南角约 920 米处, 探明汴河故道一段, 该河道与城外由二建筑综合加工厂延伸过来的河道相对应, 考虑到今西城墙下压宋内城西城墙, 故确定其所经过的西城墙处当为宋汴河西角门子遗址的位置。除上所述, 当地考古工作者, 根据考古调查和文献考证, 又大体界定了几座城门的位置。如西城墙北门阊阖门, 在今开封西城墙大梁门处(梁门位置, 千余年来基本未易)。西城墙南门宜秋门, 在今开封西城墙南门(小西门)附近。内城东城墙南门丽景门, 在今开封东城墙宋门附近。东墙北门望春门, 在今开封东城墙曹门附近。北城墙东门安远门, 在今开封解放大道北段河南大学附中大门附近。南墙东门保康门, 在今开封泰山庙街与前新华街相交处附近¹。

第三节、宫城和皇城的位置、范围与形制

五代时期后梁以唐汴州宣武军节度使衙署为建昌宫, 后晋更名大宁宫, 周世宗又以此为宫城, 然均“未暇增大”, “虽加营缮, 犹未如王者之制”。北宋“建隆三年(962), 广(后周)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 按图修之, 皇居始壮丽矣。”此后, 大中祥符五



〔图二十三〕北宋东京内城北城墙 T1 夯窝

年(1012)宫城土墙改为砖筑。金下隆三年(1158)在宋大内废墟上营建宫城, 史称金故宫。明洪武十二年(1379)在金故宫基址上营建周王府。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开封被黄河水淹灌, 周王府被淤埋于地下²。

一、考古调查与试掘³

(一) 宫城墙

根据考古调查勘探资料, 可知北宋宫城东墙南起今开封市图书馆北墙附近, 自南向北经市曲剧团家属院, 市文化局家属院、东华门街西侧、豆制品厂, 止于豆制品厂北侧。西距龙亭大殿 230 米, 全长约 690 米, 宫墙距地表深 5 米以下, 宫墙宽 8 — 10 米。西墙北起龙亭公园西北侧电视塔, 向南经杨家湖西岸、杨家湖与杨家西湖之间断桥处, 止于开封市麻刀厂西墙附

1 前引《北宋东京研究》50、171、17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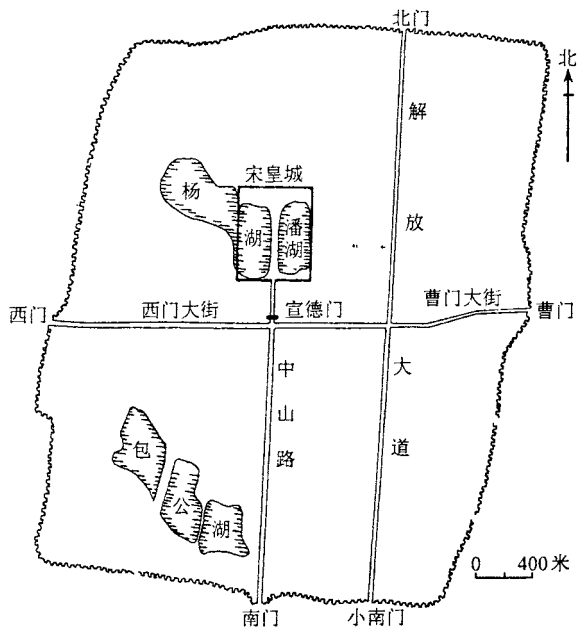
2 丘刚:《北宋东京皇宫沿革考略》,《史学月刊》,1989 年 4 期。文中引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一:“京师大内, 梁氏建国, 止以为建昌宫, 本宣武节度使治所, 未暇增大也。后唐庄宗迁洛, 复废以为宣武军。晋天福中, 因高祖临幸, 更名为大宁宫”。引《邵氏闻见录》卷一:“东京, 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军置建昌宫, 晋改为大宁宫。周世宗虽加营缮, 犹未如王者之制。”《宋史·地理志》:“建隆三年, 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 按图修之, 皇居始壮丽矣。”《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十一:“太祖建隆三年正月十五日, 发开封、浚义民数千, 广皇城东北隅。五月, 命有司按西京(洛阳)宫室图修宫城。义成军节度使

韩重赕督役。四年五月十四日诏重修大内, 以铁骑都将李怀义、内班都知赵仁遂护其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七, 大中祥符五年正月, 下诏“以砖垒皇城”。《大金国志·海陵炀王上》卷十三记载, 贞元三年, 汴京“天火焚之, 宫室皆尽”。《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 金“正隆三年十二月……, 命左丞相张浩, 参执政事敬嗣晖营建南京宫室”。明周王府的营建, 见《如梦录·周藩记》第三。

3 丘刚、董祥:《北京东京皇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 收在前引《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前引《北宋东京皇宫沿革考略》,《北宋东京三城的营建和发展》。

近, 全长约 690 米。宫墙距地表深 5 米以下, 宫墙残宽约 8 米。南墙西起市麻刀厂西墙附近, 向东经原午朝门影剧院、午朝门、宋都御街停车场、市杂技团东院, 止于市图书馆北墙附近。南墙基本位于龙亭东湖(潘家湖)和西湖(杨家湖)南岸一线, 全长约 570 米。南墙西段距地表深约 4 米, 其余地段距地表深 4.5—5 米, 宫墙残宽 10—12 米。北墙东起市豆制品厂北部, 向西经市人民检察院北侧, 龙亭公园大殿后墙处, 止于龙亭公园西墙附近, 全长约 570 米。北墙距地表深约 6 米, 宫墙残宽约 12 米〔图二十四〕。

在北宋宫城北墙东段, 于西距龙亭大殿台基约 38 米处的公园东墙内开一探方〔图二十五 T1〕。在探方中部偏北第 4—5 层文化层中发现明周王府紫禁城北墙, 残墙距地表深 3.4—4.3 米。墙顶残宽 3.6—4.2 米, 底部残宽 5.05—8.2 米。城墙棕褐色土夯筑, 夯层厚 20—25 厘米, 夯窝圆形浅平底, 直径 3 厘米, 深 1—1.5 厘米。夯窝排列稀疏, 间距约 6 厘米。在城墙底部内外两侧发现包砖痕迹。然后又在该墙底部两侧各开一条探沟和探方, 试掘结果表明, 北宋宫城北墙被叠压在明周王府紫禁城北墙之下。北宋宫城北墙距地表深约 5.3—9.85 米, 残高 4.2—4.5 米。城墙构筑可分上中下三部分, 上层为棕褐色夯土层, 厚 3.7 米, 夯层厚 8—10 厘米, 一般厚 9 厘米。每层下半部为碎砖瓦层, 上半部为夯土层。中间部分砌筑青砖层, 厚 0.6 米, 共四层, 每层厚约 15 厘米。青砖大致为 14.5×18×5 厘米, 排列整齐, 砖间白灰勾缝。下部是棕褐色夯土层, 厚 0.4 米, 夯层一般厚 10—20 厘米, 最下接生土层。城墙内包含物主要是唐宋时期的各种瓷片和瓦片等。发掘者推断, 中部青砖层应是大中祥符五年“以砖垒皇城”的遗迹, 青砖



〔图二十四〕北宋东京宫城实测平面图

上面的夯土层为北宋末期或更晚的金、元时期构筑, 青砖下面的夯土层是北宋早期或更早的五代和唐汴州节度使衙署北墙¹。

(二) 门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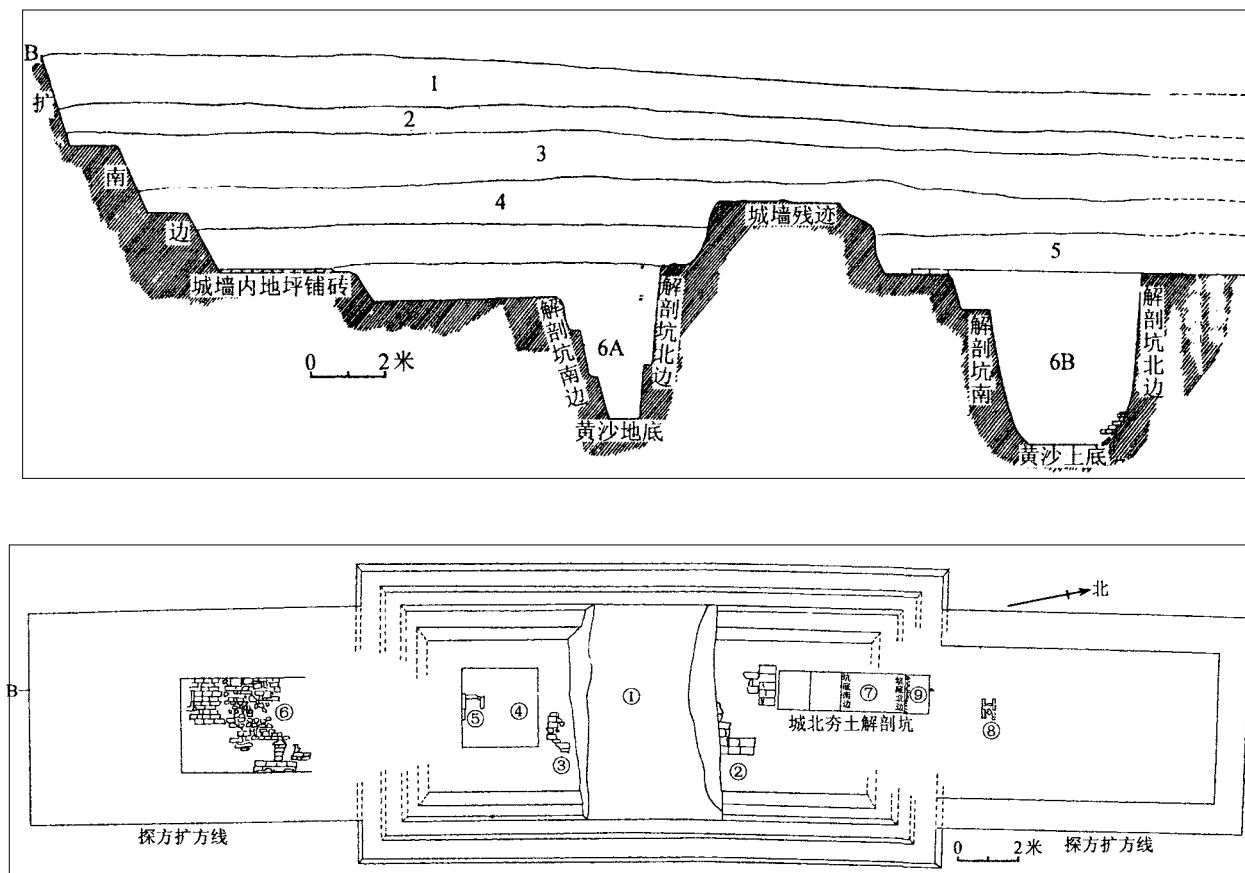
在龙亭公园大门前石狮处〔图二十六〕, 于距地表深 3.5—4 米发现一建筑基址。基址西距勘查所知北宋宫城西南角约 250 米, 基址以午朝门石狮为中心, 东西约 70 米, 南北约 30 米。基址夯筑, 杂有大量砖瓦和白灰, 其下仍为夯土层。钻探至距地表深 6.5 米左右又出现砖瓦层, 因工作条件所限, 砖瓦层厚度尚未搞清楚。发掘者根据基址位置、地层深度和出土遗物判断, 基址上部应是明周王府紫禁城正南门端礼门遗址, 下部砖瓦层为宋代门址²。

在龙亭大殿台基北 15 米左右, 东距龙亭公园东墙约 70 米处发现一缺口, 其南与午朝门发现的门址对直。

1 前引《北宋东京皇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

2 前引《北宋东京皇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周诚:《宋东京考》(中华书局, 1988 年)卷一,“宫城”记载:“乾元门(即宣德门)内正南门曰大庆”,“凡

殿有门者, 皆随殿名”。根据正文对东华门位置, 及后注对紫宸殿位置的推断, 似可认为午朝门下最底层之宋代门址为大庆门遗址。参见正文及后注。



〔图二十五〕北宋东京宫城东墙 T1 平面图（上）及 T1 东壁局部解剖图（下）

缺口宽约 30 米，其两侧城墙距地表深约 3 米，城墙残宽 6—8 米。探查者根据缺口位置（北墙其余地段未发现缺口）和深度推断，缺口为明周王府紫禁城北墙承智门遗址，下部是北宋宫城墙北门拱宸门遗址¹。

在龙亭东湖（潘家湖）东岸市文化局家属楼北端，即东华门街北端与东明街南端之间的东西横道附近发现一缺口。缺口距探查所知北宋宫城东南角约 135 米，缺口宽约 15 米，其两侧城墙残宽约 6 米，距地表深 3—4 米。探查者联系缺口处于东华门街，结合城墙深度推测，缺口应是明周王府紫禁城东门礼仁门遗址，其下部为北宋宫城东华门遗址²。

在午朝门之南约 400 米的新街口附近，于距地表深约 4.5 米处发现一门址〔图二十七〕。门址下仍为夯土，距地表深 8.3 米处又发现一建筑基址，距地表深 10 米左右达生土层。在该门址西南角的开封师专教学楼群间勘探，距地表深 4.5—6.3 米间又现发前述门址残迹和明代绿釉琉璃瓦等构件。后配合拆迁工程，在前述门址东南部于距地表深 4.5、6.3、8.2 米处，普遍发现三层建筑残迹叠压现象。在距地表深 4.5 米处发现绿釉琉璃瓦、朽木块等遗物。综合上述现象，探查者推断，距地表深 4.5 米的门址为明周王府萧墙南门午门遗址，其面积约为东西 70 米，南北 50 米。

1 前引《北宋东京皇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

2 前引《北宋东京皇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



〔图二十六〕龙亭公园大门前石狮



明午门遗址下距地表深 6.3 米的遗址，是金故宫正门五（午）门遗址，距地表深 8.2 米的遗迹是宋代门址¹。

（三）殿址

在龙亭公园的石桥与嵩呼之间探出一殿址，殿基东西宽约 80 米，南北最大进深 60 米，建筑台基凸字形²，夯筑。台基四壁均包青砖，四周环有宽约 10 米，长近千米的包砖夯土廊庑。探查者推断为北宋宫城大庆殿遗址（按，此说未提供证据，存疑）³。

1 前引《北宋东京皇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结语部分说：“在今龙亭公园大门前石狮处发现的皇城南墙中部明周王府端礼门遗址为宋代门址。该石狮为‘宋之镇门狮子也’（《如梦录·周藩记》第三）。据前人考证：‘石狮子旧在南十字街口（今新街口），雍正十年修万寿宫于龙亭上，始移植在今所’（《如梦录·周藩记》第三引清宋继郊：《石行》序）。”文中认为午朝门处宋代门址，新街口处宋代门址均有是宣德门遗址的可能性。我们认为新街口处宋代门址为宣德门遗址。详见后文和后注。

2 按宋宫城内大殿平面呈“工”字型（详见后文），此言凸字形，似仅为发掘部分的局部形制。

3 前引《北宋东京三城的营建和发展》。根据前面正文介绍的东华门

二、宫城和皇城的形制

（一）文献所记宫城和皇城的布局〔图二十八〕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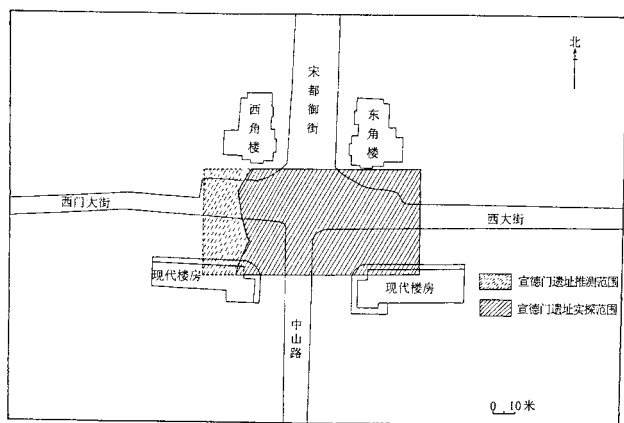
宋太祖修宫城时，要求“凡诸门与殿须相望，无得辄差，故垂拱、福宁、柔仪、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于升龙、银台等门皆然，惟大庆殿与端门少差尔”⁵，此后宣德门（端门）经改建亦与大庆殿在一条直线上⁶。宫城“正南门曰大庆，东西横门曰左、右升龙。左右北门内各二门曰左、右长庆，左、右银台”，“东西面门曰东华、西华”，“东华门内一门曰左承天祥符，西华门内

位置，所发现的殿址在东、西华门街之北，故不可能是大庆殿遗址，而应是其北的紫宸殿遗址。详见后文和后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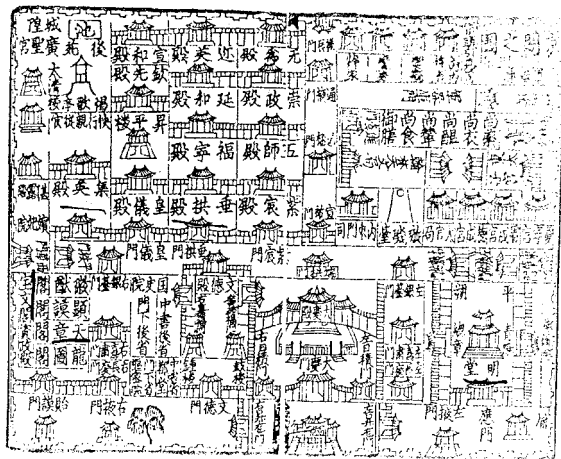
4 文献记载的北宋宫城，行文含混，主要坐标点和主要配置的方位不太明确，故后人仁智各见，看法不一。本文主要依据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二章，一宫城；郭黛姮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宋、辽、金、西夏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年）第三章，第一节北宋宫殿进行介绍。

5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一。

6 《宋会要辑稿·方域三》，建隆四年改建，宋太祖命翰林学士陶谷撰碑以记述其事。



〔图二十七〕新街口附近门址位置示意图



〔图二十八〕北宋东京宫城图（载《事林广记》）

一门曰右承天。左承天门内道北门曰宣祐，“北一门曰拱宸”¹。宫城四隅建角楼。宫城的布局，以东、西华门间横街为界，将宫城分为外朝和内廷两大部分。东、西华门干道之北，以宣祐门和拱宸门间南北路为界，其西为内廷，其东为太子宫、学士院和内诸司等。此外，在宫城西北部又有后苑。

1、外朝

外朝的主体建筑是大庆殿和文德殿。宣德门内正南门称大庆门，两门间有左右廊，廊分置左右升龙门。大庆门内正北中轴线上置大庆殿（宫内最高大雄伟的建筑），殿九间，东西挟各五间，殿前有龙墀、沙墀，殿后有阁（斋需殿），阁后为大庆殿后门端拱门。大庆殿庭院有左右廊各六十间，廊中间分置左右太和门²，殿

庭设钟鼓楼。大庆殿殿庭广阔，“可容数万人”，“每遇大礼，车驾斋宿及正朔朝会于此殿，凡朝会册尊号，飨明堂恭谢天地，于此殿行礼。郊祀，则斋宿殿之后阁。”³

文德殿在大庆殿之西。进宣德门经右昇龙门至端礼门（“凡三门，各列戟二十四支”），入端礼门正北对文德门，二门间为朝堂。进文德门正北对文德殿，殿庭东南隅置鼓楼，西南隅置钟楼，庭院东西廊分置左右嘉福门，殿左右分置东西上阁门。殿后有阁，北临东、西华门间横街，后阁与街北垂拱殿之间有柱廊相通（为宫城南北建筑群的连接处）。文德殿为常朝正衙殿，“太祖时，元朔亦御此殿，其后常陈入阁仪如大庆殿，飨明堂，恭谢天地，即斋于殿之后阁。熙宁以后，月朔视朝御此殿”⁴。

1 《宋史·地理志一》东京条。

2 周诚：《宋东京考》（中华书局，1988年），11页左右太和门下说：“初曰日华，月华。大中祥符八年改今名。”

3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一，“大内”条。前引《宋东京考》卷一，“宫城”引《石林燕语》：“大庆殿初名乾元，太平兴国、祥符中，皆因火改为朝元、天安，景祐中（《宋史》载明道三年），改今名。有龙墀、沙墀。凡正至大朝会、册尊号则御焉。郊祀大礼，则驾宿于殿之后阁；百官为次，宿于前之两廊。皇祐初，始行明堂之礼，又以仁宗御篆‘明堂’二字，飞白‘明堂之门’四字，每行礼则旋揭之，事已复去。又引《朝野类要》：“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大礼，奏请致斋，则皆大庆殿”。引《归田录》：“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在大庆殿为明堂”。

4 《宋史·地理志一》：“正衙殿曰文德（宋初曰文明，雍熙元年改今名。熙宁间，改南门曰端礼），两掖门曰东、西上阁。东西门曰左右嘉福（宋初曰左、右勤政，明道元年十月改今名）。”前引《宋东京考》卷一“宫城”

引《石林燕语》：“文德殿在大庆殿之西少次，旧曰端明，后改文明，祥符中因火再建，易今名”；“每月视朝，则御文德，所谓过殿也。东西阁门。皆在殿之两旁”；“文德遇受册发册、明堂宣赦亦御，而不常用”。引《画墁录》：“文德殿正衙，与大庆殿排行，殿后即是横街。”引《尘史》：“文德殿外为朝堂，常以殿前东庑设幕，下置连榻，冬毡夏席，谓之百官幕次。凡朝会必集于此，以待进班，然后入。近年则不然，多萃于文德殿后，以至尚衣库、紫宸、垂拱殿门外、南庑。其坐于幕次，不过数十人而已。”引《温公续诗话》：“文德殿，常朝所也。宰相奏事毕，乃来押班，常至日晡。”引《涑水记闻》：“本朝御文德殿，行入阁之仪。”《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三：“太祖时，元朔亦御此殿，其后常陈入阁仪如大庆殿，飨明堂，恭谢天地，即斋于殿之后阁。熙宁以后，月朔视朝于此殿。”周诚：《宋东京考》卷二“宫城”，引《退朝录》：“本朝视朝之制，文德殿曰外朝，凡不釐务朝臣（添差之官，不理政事也）日赴，是谓常朝。”

前述端礼门与文德门间的朝堂，置主要中央衙署。“入（右掖门）东去街北廊乃枢密院，次中书省，次都堂、次门下省、次大庆殿”¹，以后又建中书门下省和国史院。都堂又称政事堂，“榜曰中书，为宰相治事之所”²。此外，政事堂亦称东府，管理行政；其西的枢密院又称西府，管理军政，两者对持文武二柄，“号称二府”³。

在枢密院之西，从右掖门向北穿右长庆门经右嘉肃门至右银台门，为文德殿建筑群西侧的南北通道，北接东西华门间横街。该南北通道之西有显谟、徽猷等阁⁴。显谟阁藏神宗御集，路东有宣徽院、学士院⁵。

大庆殿建筑之东，从左掖门向北穿左长庆门经左嘉肃门至左银台门，为一南北通道，北接东西华门间横街。该道之东有集贤、昭义、史馆等三馆，三馆北有秘阁，后改为崇文院（又称馆阁），是宫城内藏书之所。三馆火灾后，神宗时改为秘书省。徽宗政和五年（1115）迁秘书省于宣德门外，以其地建明堂⁶。

2、内廷西部〔图二十九〕

东、西华门间横街之北为内廷，其中宣祐门至拱宸门南北通道之西的内廷西部为视朝之殿和寝宫区。紫宸殿在大庆殿北偏西，乃皇帝“正朔视朝之前殿”（旧名崇德，明道元年改）⁷。紫宸殿之西，文德

殿之北有垂拱殿，是皇帝“常日视朝之所”（旧名长春，明道元年改），紫宸、垂拱二殿有柱廊相通⁸。垂拱殿西有皇仪殿（开宝四年赐名滋福，明道元年十月改），咸平年间明德太后曾居此。再西集英殿（旧名广政，开宝三年曰大明，淳化间曰含光，大中祥符八年曰会庆，明道元年十月改今名），为御宴和殿试之所。集英殿后有需云殿，“宴殿也”（旧名玉华，后改琼华，熙宁初改今名）。在皇仪殿、集英殿之东北有昇平楼（旧名紫云，明道元年改），是“宫中观宴之所”⁹。

紫宸殿北偏东，内东门北有崇政一组宫殿。崇政殿（旧名简贤讲武，太平兴国二年改今名），是皇帝“阅事之所”。殿前东西分置延义、迹英二阁，殿后有柱廊通延和殿（倒座殿，便坐殿也。大中祥符七年建，称承明殿，明道元年改端明，二年改今名）。延和殿北有景福殿，殿前左右廊庑，“旧试贡举人，考官设于两廊”（《宋会要辑稿·方域一》）。熙宁以后，景福宫置“内帑库物”，是宫内储藏金帛最多的地方¹⁰。

在垂拱殿后，有福宁一组宫殿。福宁殿在垂拱殿北，原名万岁殿，皇帝正寝殿¹¹，殿前有左右昭庆门。殿后柔仪殿（初名万岁后殿，真宗时章献明肃皇太后居之），又后钦明殿。其北有坤宁殿一组建筑，

1 《东京梦华录》卷一，大内条。

2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

3 《宋史·职官志·枢密院》。

4 前引《宋代东京研究》32页。

5 郭湖生：《北宋东京》，《建筑师》，71期，1992年4月。

6 明堂“开局兴工，日役万人”，政和七年建成。明堂号称“布政之宫”，是宣明政教之所，凡朝会、祭祀、庆赏等大典，均在此举行。明堂未建成之前，多用大庆殿举行此类活动。此外，图二十九宫城复原图三馆位置在通道之西似值得商榷。

7 前引《宋东京考》卷一，“宫城”引《枫窗小牋》。又引《石林燕语》：“紫宸殿在大庆殿之后少西，其次又为垂拱殿。自大庆殿后，紫宸、垂拱之两间，有柱廊相通”；“月朔不御过殿，则御紫宸，所谓入阁也。月朔与诞节，郊庙礼成受贺，契丹辞见，亦御紫宸殿”；“紫宸不受贺，而拜表称贺，则于东上阁门”。卷二，“宫城”引《丹铅总录》：“紫宸，便殿也”；引《朝野类要》：“贺祥瑞，圣寿赐宴，则紫宸殿。”

8 前引《宋东京考》卷一，引《枫窗小牋》。又引《石林燕语》：“惟垂拱为日御朝之所。”卷二，“宫城”引《退朝录》：“垂拱殿曰内朝，宰相以下要近职事者并武班日赴，是谓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臣并赴

内朝，谓之百官大起居。”《宋会要辑稿·方域》三之三：“每日枢密使以下立班殿庭候传宣，不坐，即过垂拱殿起居，每门内东西两廊设二府、亲王、三司、开封府，学士至待制、正刺史以上候班幕次。”参见前注。

9 前引《宋东京考》卷一，“宫城”，引《枫窗小牋》。又引《石林燕语》：“集英殿，旧大明殿也，明道中改今名。每春秋大燕，皆在此。太祖尝御策制科举人，故后为进士殿试之所。其东廊后，有楼曰昇平，旧紫云楼也，每大燕，则宫中登而观焉。皇仪殿旧名滋福，咸平中，太宗明德皇后居之，以为万安宫。后崩复旧，明道中改今名。故常废而不用，以为治后丧之所。”

10 前引《宋代东京研究》33页说：崇政殿东西有延义（一作羲）、迹英二阁，是“是侍臣讲读之所”（《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崇政殿后有柱廊通延和殿，真宗刘后曾“垂帘参决朝政于此”。此延和殿北向，“俗呼‘倒座殿’”（《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七）。熙宁以后，景福殿置“内帑库物”（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一），是宫内储藏金帛最多的地方。

11 史载太祖召弟晋王赵光义入宫，在福宁殿对饮时，发生光义弑兄事件，史称“烛影斧声”，“烛光斧声”。

坤宁殿为皇后寝殿。福宁殿东为庆寿宫，内有庆寿、萃德二殿；福宁殿西为宝慈宫，内有宝慈、姒徽二殿，以上二宫前者为太皇太后居所，后者为皇太后居所¹。

在宝慈宫之西，有龙图阁等一组建筑群。龙图阁在昇平楼西北，大中祥符初建，内藏太宗御集御书 5115 卷、轴、册。阁东序有资政、崇和二殿，西序有宣德、述古二殿；又列六阁，贮经典、史传、子书、文集、天文、图画。其北为天章阁，天禧五年建，以奉真宗御集御书，阁东西序有群玉、藁珠二殿。又北宝文阁，奉仁宗御笔御书，阁东西序分置嘉德、延昌二殿，“殿间以桃花文石为流杯之所”²。

在西华门内之北有旧延福宫、广圣宫建筑群。延福宫内有穆清、灵顾、性智三殿和奉宸五库³，为百司供应之所。北为广圣宫（原名长宁宫，前殿有道家天神之像，后起馆阁以奉真宗御容），是后宫祈祷的地方之一⁴。宫内有太清、玉清、冲和、集福、会祥五殿。广圣宫北接后苑。

3、内廷东部〔图二十九〕

东华门至宣祐门以北，拱宸门至宣祐门之东为内廷东区，是“内诸司”集中之地⁵，“宣祐门南北大街西廊向东曰凝晖殿，乃通会门入禁中矣。殿相对东廊门楼，乃殿中省六尚局御厨，……殿之外皆知省、御药幕次、快行、亲从官、辇官、车子院、黄院子”⁶。

按凝晖殿会通门即内东门，它与对相对的东廊门楼之间有柱廊相通，是宫城东西两大建筑群的结合处，人员往来，物资供需皆由此。

殿中省六尚局北有资善堂、讲筵所⁷。宫城东北角有军器库、军头引见司、入内内侍省、内侍省、快行家等。谕门南廊有庆宁宫，东华门里有皇太子宫。宣祐门东廊有内东门司（宫城物资采办供应机构），再东皇城司（为皇帝耳目之探事机构）。在六尚局之南设天文院，内有漏刻、观大台、铜浑仪⁸。

4、后苑

后苑位于内廷西区北部（景福宫、广圣宫北），后苑之迎阳门在延和殿西北（大中祥符七年建，原名宣和，仁宗时改开曜，再改迎阳，俗称苑东门）。太祖时已有后苑⁹，但主要建筑成于真宗、仁宗时期。苑内建筑密集，殿台楼阁、假山池沼、异花竹木、珍禽鱼类、无所不有。其中不乏藏书之所，如太清楼，真宗景德四年三月，藏太宗御制及墨迹石本 934 卷、轴，四部群书 33725 卷。徽宗时将所得新本书，缮写几份，一份藏于太清楼。玉宸殿（旧名化成殿），乃皇帝“宴息之所”，殿之东西聚书八千余卷，此后群书增至 11293 卷，太宗御集、御书又 753 卷。保和殿（政和三年建），左挟阁设古今儒书，史子楮墨，右挟阁存道家金柜玉笈之书；稽古阁存汉、晋、隋、唐书画，

1 图二十九在宝慈宫后有睿思殿、宣和殿一组建筑。

2 参见前引《宋代东京研究》3 页。前引《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前引《宋东京考》卷一，“宫城”；卷二“六阁”，除前述三阁外，文中又记述了显谟阁（藏神宗御集）、徽猷阁（大观二年建，藏哲宗御集）、敷文阁（藏徽宗御集）。引《却扫编》：“国朝创立诸阁，以藏祖宗御制。”

3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九月记事，奉宸五库旧名宣圣殿五库，一宣圣殿内库，二穆清殿库，三崇圣殿库，四崇圣殿受纳真珠库，五崇圣殿乐器库，此时一度合为一库。

4 《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六，景祐二年正月己酉条。

5 《东京梦华录》卷一内“诸司”：“内诸司皆在禁中。如学士院、皇城司、四方馆、客省、东两上阁门、通进司、内弓剑枪甲军器库、翰林司（茶酒局也）、内侍省、入内内侍省、内藏库、奉宸库、景福殿库、延福宫、殿中省、六尚局、诸阁分内香药库、后苑作、翰林书艺局、医官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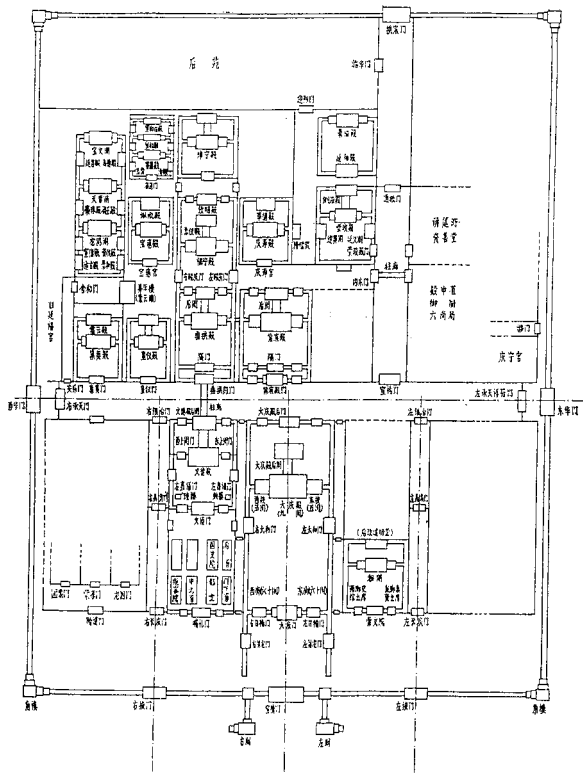
天章等阁；明堂颁朔布政府。”其中绝大部分位于内廷东区。又《宋东京考》卷三“诸司”，对内诸司各机构职能有较详细的解释。

6 《东京梦华录》卷一“大内”：“宣祐门南北大街西廊向东曰凝晖殿，乃通会门入禁中矣。殿相对东廊门楼，乃殿中省六尚局御厨，殿上常列禁卫两重，时刻提警，出入甚严，近里皆近侍中贵。殿之外皆知省、御药幕次、快行、亲从官、辇官、车子院、黄院子。内诸司兵士，祇候宣唤，及宫禁买卖进贡，皆由此入。”

7 资善堂，讲筵所，原在宣祐门内东廊次北，为仁宗幼年就学之地。后迁六尚局北，为皇帝与执政大臣讲读处之一，徽宗时诸王子亦于此就读。

8 彭乘：《墨客挥犀》卷七。

9 《宋史·河渠·金水河》记载，太祖乾德三年（965），引金水河“贯皇城，历后苑，内庭池沼，水皆至焉”。



〔图二十九〕北宋东京宫城布局示意图，《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296页

古鼎彝器。流杯殿，“唐明皇书山水字于右，天圣初自长安辇入苑中”。苑内其他建筑略¹。

（二）与皇城相关的延福宫、艮岳和上清宝篆宫

1、延福五位和六位

政和三年春（1113），建延福宫“于大内拱宸门外。旧宫在后苑之西南，今其地乃百司供应之所，凡内旧坊、裁造院、油醋柴炭鞍辔等库，悉移它处。又迁两僧寺、两军营、而作新宫焉”²，即新延福宫。该宫“东

西配大内，西北稍劣。其东值景龙门，西抵天波门，宫东西两横门，皆视禁门法，所谓晨晖、丽泽者也，而晨晖门出入最多”³。宫之南门即宫城拱宸门，其北抵内城北城墙。该建筑群，蔡京命童贯、杨戩、贾祥、蓝从熙、何沂五大宦官分区负责监修，此五人“因各为制度，不务沿袭，故号延福五位”⁴。宫内在延福殿、僊珠、碧琅轩亭等左侧“复列二位”（在穆清等七殿之东西各置十五阁），右侧有宴春阁、飞华亭等建筑群，其他区域则为典型的园林建筑⁵。

北宋末年，宋徽宗又在延福宫后跨旧城建“延福第六位”。该建筑群“跨城之外浚壕，深者水三尺，东景龙桥，西天波桥，二桥之下，垒石为固，引舟相通，而桥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觉也，名曰景龙江，其后又辟之，东过景龙门至封丘门。景龙江北有龙德宫。初，元符三年，以懿亲宅潜邸为之⁶，及作景龙江，江两岸皆奇花珍木，殿宇比比对峙，中涂曰壶春堂，绝岸至龙德宫。其地岁时次第展拓，后尽都城一隅焉，名曰撝芳园，山水美秀，林麓畅茂，楼观参差，犹艮岳延福也”⁷。“花石纲”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延福宫的景观布置上⁸。

2、艮岳〔图三十、三十一〕

政和七年（1117），“命户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宝篆宫之东筑山，象余杭（杭州）之凤凰山，号曰万岁山，既成更名曰艮岳”⁹。宣和四年（1122）建成，宣和六年以金芝产于艮岳之万寿峰，又名寿岳，因“岳之正门名曰阳华，故亦号阳华宫”。艮岳在宫城东北，景

1 有关后苑的记载有：《宋会要辑稿》之《方域·东京大内》条；宋王明清：《挥尘录·余话》卷一，蔡京：《太清楼侍燕记》、《保和殿曲燕记》，四部丛刊本。以及《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五，景德四年三月乙巳；卷一六〇，庆历七年三月癸未；卷一〇四，天圣四年四月乙卯；卷五二〇，元符三年正月乙酉等条。

2 《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京城》。

3 《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京城》对延福宫有较详细的记述。

4 宋袁褰：《枫窗小牋》卷上，《历代小说集成》，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5 《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京城》，前引《枫窗小牋》卷上。

6 懿亲王邸，即李遵晏娶公主后的宅第，原为驸马王貽永旧居，收

官后转赐李家。徽宗再加建造，“穷极奢侈，为一时之壮观”。徽宗移居龙德宫后，将宣和殿的陈列物移此，这里成为宫城内外环境最佳的地方。

7 前引《枫窗小牋》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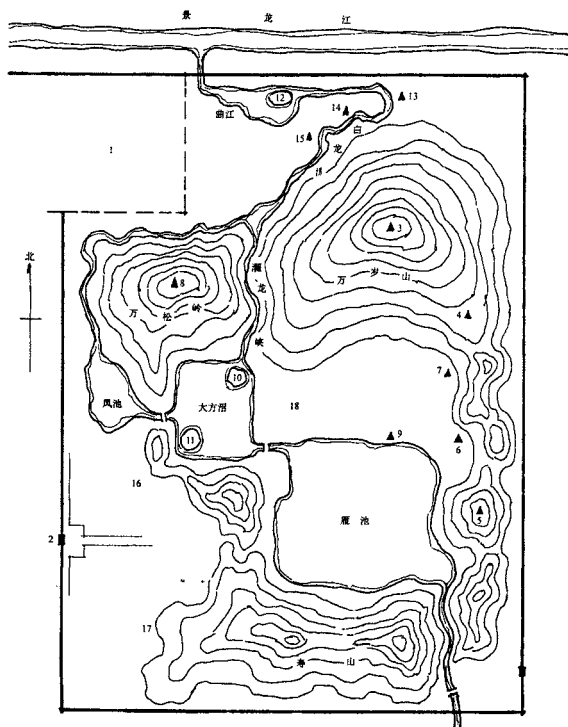
8 徽宗为营建艮岳等，广事搜求江南石料和花木，设“应奉局”于平江（苏州），派朱勔主管应奉局和“花石纲”事务。“纲”是宋代水路运输货物的组织，全国各地从水路运往京都的货物均编组，一组谓之一“纲”。

9 李濂：《汴京遗迹志》。《挥尘录·后录》卷二，李质：《艮岳赋》中说：“夫艮者，八卦之列位，岳者，众山之总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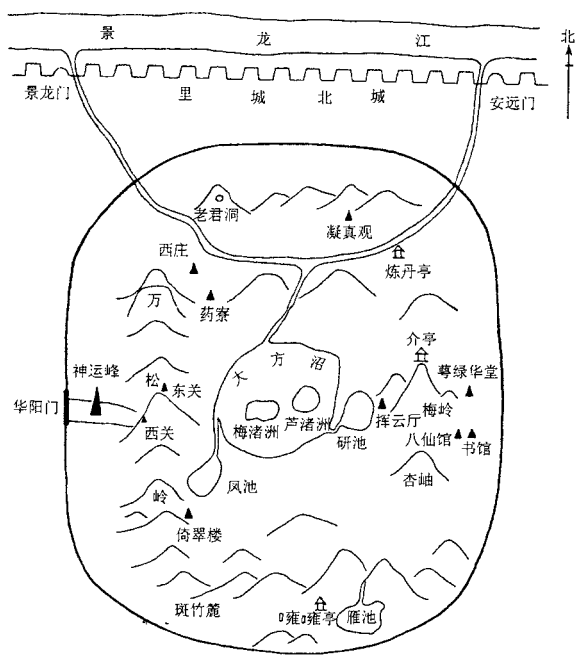
龙门内以东之地，东以封丘门内马行街为界。其东西约 600 米，南北约 500 米，直线周长 2200 米，约四宋里，《宋史》、《汴京遗迹志》等记“艮岳周围十余里”似误¹。

宋徽宗亲自参与建园工作，修建工程由“博雅忠荃、思精志巧、多才可属”的宦官梁师成主持。园内“左山右水”，山体从北、西、南面包围水体。北面土石筑主山“万岁山”（意在仿杭州凤凰山），主峰高九十步为全园最高点，上建介亭。山西隔溪间为侧岭“万松岑”，上建巢云亭。万岁山东面小山“横亘二里曰芙蓉城”，水体南面稍低次山称寿山或南山。从园西北角引景龙江水，入园后为“曲江池”（似拟名唐长安曲江池），在山体内形成“大方沼”、“雁池”等水面。园内以建筑点缀，结合山、水、花木成景，景观十分丰富。仅宋人李质、曹组《艮岳百咏诗》就列举了园内百余处景点题名。宋徽宗《艮岳记》和僧人祖秀《华阳宫记》等，对艮岳景物有详尽描述，另外还有两幅复原图可供参考〔图三十、三十一〕，其具体情况不赘述。

艮岳重在以山水“放怀适情，游心赏玩”。所运“花石纲”大都用于此。营造艮岳“按图度地，庀徒僦工”，构思独特，精心经营。园内“亭堂楼馆，不可殫记”，几乎包罗了当时的全部建筑形式。其山主宾分明，远近呼应，形成了完整的山系。其水面几乎包括了河、湖、沼、溪、涧、瀑、潭等全部形态，有完整的水系。山系与水系山嵌水抱，虚实相生互补，统一和谐，风水条件极佳。园内植物品种繁多，不同景区均以植物之景为主题，其间放养珍禽异兽众多（仅大鹿就有数千头）。总之，艮岳将叠山、理水、花木、建筑完美结合，是大自然生态环境与各地山水奇景的高度概括，因而“凡天下之美，古今之胜在焉”²。使之成为具有浓厚诗情画意和文人园林志趣，而少皇家气派的



〔图三十〕艮岳平面设想图（一）



〔图三十一〕艮岳位置及平面设想图（二）

1 参见前引《北宋东京城研究》259—261页。从宋徽宗：《艮岳记》：“北俯景龙江，长波远岸，弥十余里”来看，所谓周十余里似将艮岳、延福宫及城北景龙江景区连在一起的周长。

2 祖秀：《华阳宫记》。又宋徽宗：《艮岳记》载：“天台、雁荡、凤凰、庐阜（山）之奇伟，二川、三峡、云梦之旷荡，四方之远且异，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罗列，又兼胜绝。”

人工山水园。所以艮岳被视为中国古典园林成熟时期的标志，是一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园林作品。

3、上清宝箓宫

上清宝箓宫在景龙门东，与晨晖门相对。政和五年，宋“徽宗因林灵素之言，建上清宝箓宫，密连禁署。宫中山包平地，环以佳木清流。列诸馆舍台阁，多以美材为楹栋，不施五采，有自然之胜。上下立亭宇，不可胜计。又作仁济、辅正二亭于宫前，命道士施民符药。徽宗时登皇城下视之。由是开景龙门，城上作复道，通保箓宫，以便斋醮”¹。宝箓宫“极土木之盛，灿金碧之辉，危殿杰阁，瑶室脩廊，为诸宫之冠云”²。

（三）宫廷广场与主要衙署的配置

宣德楼前为宫廷广场。《东京梦华录》卷二“御街”条记载：“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杈子之外。杈子里有砖石甃砌御沟水两道，宣和间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文中“约阔二百余步”非指南面御街全程而言。《东京梦华录》卷六《元宵》条记载：“正月十五日元宵……，开封府绞（应作结）缚山棚（所结彩山为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日新耳目”，“灯山上綵”，“自灯山至宣德门楼横大街，约百余丈，用棘刺围绕，谓之棘岔（阙下灯山前为大乐场，编棘为垣，以节观者，谓之棘盆）”。内设两长竿，高数十丈，以绦结束。纸糊百戏人物，悬于竿上……。内设乐棚，差衙前乐人作乐杂戏，并左右军百戏在其中。”据此可知，“约阔二百余步”即“自灯山至宣德门楼横大街，约百余丈（百余丈与二百步基本相同）”的“棘

盆”范围。也就是宣德楼和左右掖门前横街至宣德楼前南面御街百余丈略呈“T”字形部分（从文献行文看，宣德楼前横街所涉及部分较南面御街略宽，已略呈“T”字形），这个范围即是目前所习称的宫廷广场（模仿北宋东京大内的金中都之宫廷场已呈“T”字形）。

除上所述，从宣德门至州桥这段御街两侧还是一些主要中央衙署所在地。《宋东京考》卷四《中书省》条引《石林诗话》记载：“元丰初，始建东西府于右掖门之前，每府相对为四位，俗谓之八位”，“东府与西阙门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门”（宋以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一号称二府，枢密院为西府、中书省为东府）。《东京梦华录》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官宇》条记载：宣德楼前“右廊南对右掖门（应为右南廊对……），近东则两府八位，西则尚书省。御街大内前南去，左则景灵东宫，右则西宫。近南大晟府，次曰太常寺。州桥曲转大街面南曰左藏库。”同书卷三“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条记载：“大内西去，右掖门祆庙，直南浚仪桥。街西尚省书东门，至省前横街，南即御史台，西即郊社，省南门正对开封府后墙（开封府治在内城浚仪桥西北）。”《宋史》卷一百一《礼四》明堂条记载，“政和五年（1115）乃徙秘书省宣德门东，以其地为明堂”。总之，在宣德楼前按传统配置左祖右社，部分中央衙署较集中地置于宫廷广场两侧（以西侧为主）及其延长线上。此外，还有一些官署性质的机构散置于城内它处（下文有说）。

（四）宫城皇城的构成、形制与规模

《宋会要辑稿·方域》记载：“大内据阙城之西北，宫城周回五里。”《宋史·地理志》记载：“宫城周回五里。南三门，中曰乾元（宣德），东曰左掖、西曰右掖，东西面门曰东华、西华，北一门曰拱宸。”此外，

1 前引《宋东京考》卷十二，引《宋史》。

2 前引《宋东京考》卷十三，引《宣靖妖化录》。

还有熙宁十年赐名的谯门，位于东华门北，是宫城东墙的别门¹。由于文献未言明宫城的确切位置，“宫城周回五里”也不涉及宫城的形制，故历来猜测颇多。根据前述考古资料介绍宫城城墙的位置，可知宫城在内城北部中间偏西北，与文献所记“据阙城之西北”相当。考古勘察宫城东、西墙长约690米，南、北墙长约570米，所以其形状应呈南北长东两短的长方形。宫城各墙长度之和为2520米，约合4.5宋里（一宋里合559.872米），与文献所记“周同五里”还差半宋里。前面考古资料指明，周王府紫禁城北门承智门遗址下压的宋代门址为其宫城北门拱宸门故址；周王府紫禁城在东礼仁门遗址下压的宋代门址为其宫城东华门故址。据此再次证明，前述位于午朝门的周王府紫禁城正南门端礼门遗址下压的宋代门址似为宋宫城内大庆门故址，是有道理的。

关于北宋东京的皇城，迄今仍是不解之谜。由于记载北宋东京大内的文献，往往宫城皇城混用，概念含糊，界限不明，故导致北宋东京宫城即皇城说的流行。但是，有证据表明北宋东京大内的确有皇城。据《五代会要》卷五《大内》条记载：“周广顺元年（951）六月，敕以薰风等门为京城门，明德门为皇城门，启运等门为宫城门，升龙等门为宫门，崇元等门为殿门。”可见早在后周时大内已有宫城皇城之别²。北宋在后周宫城皇城基础上营建大内，并将明德门改称宣德门，俗称端门（隋唐洛阳皇城正门亦称端门）³，这种承袭关系表明北宋应有皇城。又《宋会要辑稿》中《方域》一之十一；《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均言“广皇城（按指后周之皇城）东北隅”，按洛阳宫殿图“修

宫城”（唐东都洛阳宫城在北，皇城在南⁴）；《宋刑统》卷七记载违反城门开启制度的处罚中规定：“其皇城门减宫城门一等，京城门又减皇城门一等。”很显然，北宋东京大内也有宫城和皇城之分。这个时期皇城的主要功能在于置主要中央衙署和其他中央机构及内诸司等。前述分析表明，都堂、中书省、门下省、枢密院等置于文德殿庭院前，大庆殿庭院西，左长安门至左银台门道路之东置三馆、秘阁，后改崇文院，神宗时改秘书省。右长安门至右银台门道路之西，置显谟等阁，宣徽院、学士院等。内廷宝慈宫之西置龙图阁等，西华门之北旧延福宫有奉宸五库。内廷东华门至宣祐门以北，拱宸门至宣祐门之东，置内诸司。上述情况表明，在外朝、内廷之南和东西两侧置主要中央衙署，有关的中央机构和诸库，凡此均属皇城职能范畴。即外朝内廷之南和东西两侧应为皇城范围，宣德门为皇城门，此时东西华门和拱宸门亦当是皇城门。其中宣德门，即前述新街口周王府萧墙正南门下压之宋代门址。宣德门（梁初曰建国，后改咸安；后晋初曰显德，又改明德；宋太平兴国三年改名丹凤，九年改乾元，大中祥符八年改正阳，景祐元年改宣德，政和八年改太极之楼，重和元年复名宣德），是大内最重要的城门，在宋代至少有两次改建。一次是在建隆四年，主要是修正明德门与大庆殿不在一条直线上，另一次在政和八年（1118）⁵。据陆游《家世旧闻》卷下记载：“宣德门本汴州鼓角门……制度极卑陋，至神宗时始增大之，然亦不过三门而已。蔡京本无学术，辄曰：‘天子五门，今三门，非古也’……因得以借口穷极土木之工。改门曰太极楼，或谓太

1 《宋会要辑稿·方域》三之三。参见前引《宋代东京研究》30—31页对谯门的分析。

2 《册府元龟》卷十四中记载，后周立国之初周太祖就于“广顺元年六月以唐都长安时京城等门比定，今东京诸门，薰风等为京城门，明德门为皇城门，启运等为宫城门”。

3 蔡绦：《铁围山丛谈》（知不足斋丛书）记载：“国朝上元节烧灯，

盛于前代，为彩山峻极而对峙于端门”。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57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5 参见徐伯勇：《北宋东京宣德楼及御街建制布局考说》，收在《中国古都研究》五、六合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

极非美,乃复曰宣德门……。”宣德门改太极楼在政和八年,即改建落成之年,改建前下部开三个门洞,改建后开五个门洞。宋徽宗绘于政和二年的《瑞鹤图》上的宣德门开三个门洞,是改建前的情况〔图三十二〕。辽宁省博物馆藏北宋铜钟上汴梁宣德门图像〔图三十三〕,门墩上开五个门洞,墩顶建平座,加勾栏,上建面阔七间单檐庑殿顶的门楼;门楼左右有斜廊,通两侧的单檐庑殿顶的朵楼;朵楼向前伸出行廊,和两阙楼相连;阙楼为三层子母阙,母阙阙楼面阔三间,子阙面阔各一间,均单檐庑殿顶;阙楼内侧城墩之下对称的各有一悬山顶小建筑,绕以短墙。其形象与《瑞鹤图》宣德门相比较,除增加门洞和阙楼改歇山顶为庑殿顶外,无大变化¹。《东京梦华录》描述:“大内正门宣德门列五门,门皆金钉朱漆,壁皆砖石间甃,镌镂龙凤飞云之状,莫非雕甍画栋,峻

角层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下列两阙亭相对……”²,其形制与铜钟上的宣德楼大体相合。

其次,营建“延福五位”和“延福六位”后,二者与大内紧密相连、相通,宋徽宗又移居龙德宫,并成为宋徽宗与权臣们经常活动的主要场所。蔡京在《延福宫曲宴记》中,就描述了徽宗与权臣们在延福宫的奢靡情况³。所以袁褰在《枫窗小牋》中,将原宫城及延福宫统称为“汴京故宫”,即“延福五位”和“延福六位”是原宫城的扩大。《新刊大宋宣和遗事》所记:徽宗“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戩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乃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写照。也就是说,“九里十三步皇城”,应是当时大内包括的宫城、皇城、延福五位和六位全部范围之周长,而是时“延福五位”、“延福六位”则应属皇城范畴⁴〔图三十四〕。这样,至宋代晚期皇城就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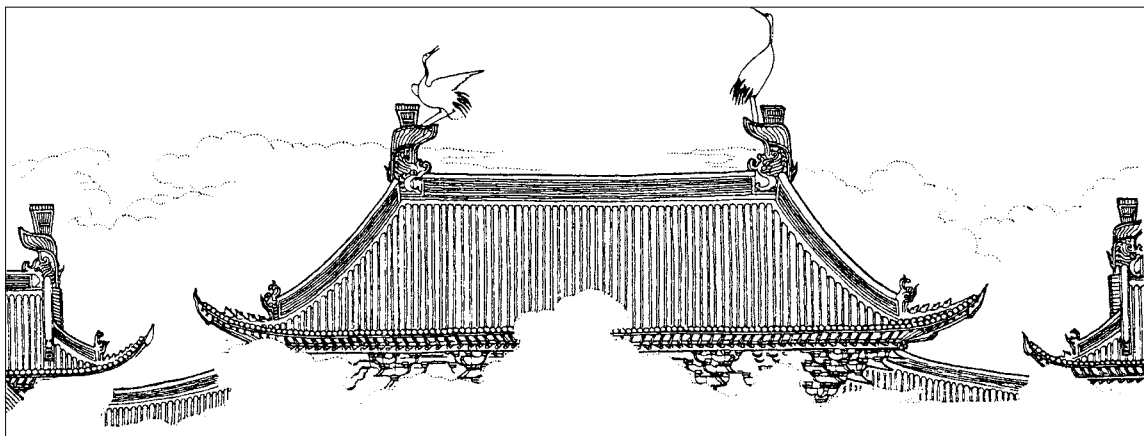
1 《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301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2 《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301页中说,宋代文献中对门阙各部分的名称用得颇不统一。《东京梦华录》上的“朵楼”,实指门外两侧的阙而言,“朵楼”是俗称。宋代正式文件中,将门前的二阙叫“阙”或观,而将门楼二侧斜廊、行廊转角处的方亭叫“朵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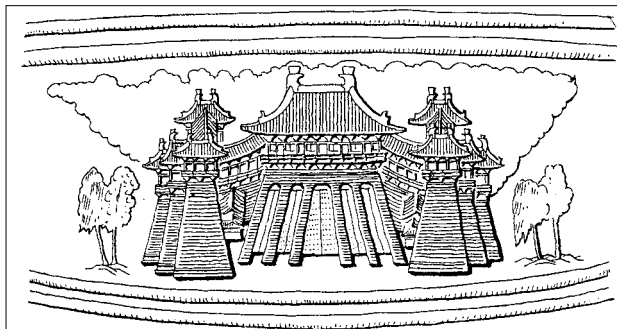
3 《挥尘录·余话》卷一。

4 北宋开封宫城和皇城周长,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为此,下面分六点进行探讨。第一,现在考古堪探报告,将宫城南墙划在午朝门东西一线,这样宫城周长就为2520米,合4.5宋里(一宋里=559.872米),较五宋里还差半宋里。第二,在午朝门之北,于石桥与嵩呼之间探出一殿基,台基东西80米,南北最宽处60米,四周环宽约10米长近千米的包砖夯土廊庑(此数据似过大,应再核查),报告认为是大庆殿遗址。按,该殿址位置距龙亭大殿较近(龙亭大殿后为宫城北墙),所占面积很大。若其为大庆殿遗址,那么在其北很难容纳其他宫殿、帝后寝殿、附属建筑和后苑等众多建筑。加之该殿址又在所发现的东华门遗址之北,故该殿址或是紫宸殿之所在,大庆殿当在其南。第三,按周王府以金宫城营建紫禁城,金宫城又是以宋宫城营建宫城,是周王府紫禁城四至同于北宋宫城。《古都开封》(中国旅游出版社,1982年)28页,《开封》(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所记明清时期的开封,均说午朝门是周王府的二门所在,午门是周王府的正南门。明人《如梦录》则说,周王府南门即宋之大宋门(按宋无“大宋门”,其位置应是宋皇城正南门)。据此结合前述,可认为在午朝门发现周王府紫禁城端礼门下压之宋代门址为大庆门,在午朝门南400米新街口发现周王府萧墙南墙正南门下压之宋代门址为宣德门。田凯:《北宋东京皇宫考辨》(《中原文物》,1990年4期)、李合群:《北宋东京皇宫二城考略》(《中原文物》,1996年3期),均认为新街口周王府萧墙午门遗址下的宋代门址为宣德门故址。这样,午朝门至新街口两门址相距400米,加上宫城东西跨度570米,所形成的东西长方形,其周长1940米 $[(400\text{米}\times 2)+(570\text{米}\times 2)]=1940\text{米}$,约合3.5宋里]即为皇城的主要范围之一。这样,其与午朝门周长应为3320米 $(2520\text{米}+400\text{米}+400\text{米}=3320\text{米}$,约合

5.92宋里)。第四,前已说明政和时期修建的延福宫(五、六位)已是大内的重要组成部分。仅“延福五位”按“东西配大内,南北稍劣”之说,其南北跨度约500米(宫城北墙与内城北墙间距),东西为570米(宫城东西宽度),以此相加,合计周长则为4320米 $[(400\text{米}+690\text{米}+500\text{米})\times 2+(570\text{米}\times 2)]$,约合7.7宋里。实际上“延福五位”“其东至景龙门,西抵天波门”,继而“跨旧城修筑”延福六位(见正文),范围又扩大许多,7.7宋里加上这些部分,其周长九里十三步是不成问题的。第五,据上所述,我们认为九里十三步乃是午朝门以北部分,午朝门至新街口宣德门部分加上延福五、六位外围周长之总和。至于文献所记宫城周长五里,只是一个概数。但文献所记周回五里含宣德门在内(《宋史·地理志》),这样其周长当为5.9宋里,概言为五里差距较大,应概言为六里。最后,再简单谈谈周王府与宋宫城皇城关系问题。前引《如梦录·周藩纪》第三记载:“周府本宋时建都宫阙旧基,坐北朝南,正对南薰门,即宋之正阳门也”,“周萧墙九里十三步”。周王府紫禁城因宋宫阙而建,已被考古勘查证明。但是,周王府萧墙,考古勘查证明,其南墙在今南京巷南口向西经西大街、新街口,前营门至开封医专西墙;东墙自南京巷向北至开封28中学;西墙位于大兴街向北至开封渔场一线;北墙位于开封人民体育场南部东西一线(参见前引《北宋东京皇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考古勘查同样证明,明周王府萧墙是在金皇城基础上修筑的(参见前引《北宋东京城研究》223—225页)。其中萧墙南墙主要地段与北宋大内南墙相合,东、西墙下无叠压宋大内宫墙证据,北墙部分地段则压于金皇宫北墙和北宋内城北城墙之下。因此金故宫皇城和因金故宫而建的周王府萧墙,在北面舍弃了北宋“延福六位”,而将北墙限定在北宋内城北墙即延福五位北墙位置,同时又将其东、西墙向两侧扩展所致。但是,周王府萧墙东、西、北墙位置较宋代大内有变化,其周长仍为九里十三步,与宋代同,这个结果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它表明周王府仍以宋代九里十三步为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似可证明宣和时大内周长九里十三步的记载不误,同时也说明九里十三步应包括延福第六位在内。



〔图三十二〕(宋)赵佶《瑞鹤图》中宣德门屋顶(摹本)



〔图三十三〕辽宁省古物馆藏北宋铜钟上宣德门图(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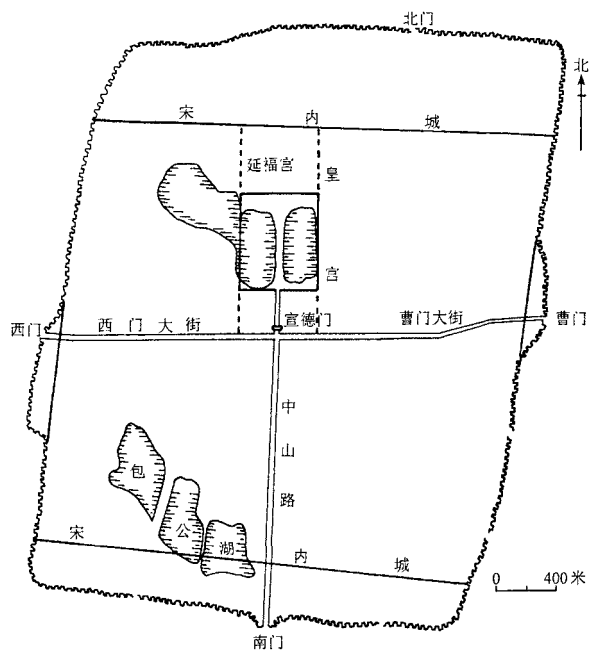
了环套宫城之势(较唐洛阳皇城形制发生变化),从而成为金中都皇城环套宫城形制之先河。

此外,宋徽宗又建上清宝篆宫和艮岳。宝篆宫通过景龙门复道与延福宫相连,艮岳与宝篆宫相邻,和延福宫水系相通,二者同时也是宋徽宗经常活动之所。因此,这一带就成为宫城皇城之外,与之近在咫尺并隶属于皇城的最重要的皇家园林。

第四节、街巷厢坊

一、街巷

北宋东京开封府城由御路、街、巷交织成交通网络,并由此构成该城平面布局 and 各类配置的骨架。其中州桥是南、东和西三条御路的交汇处,是城内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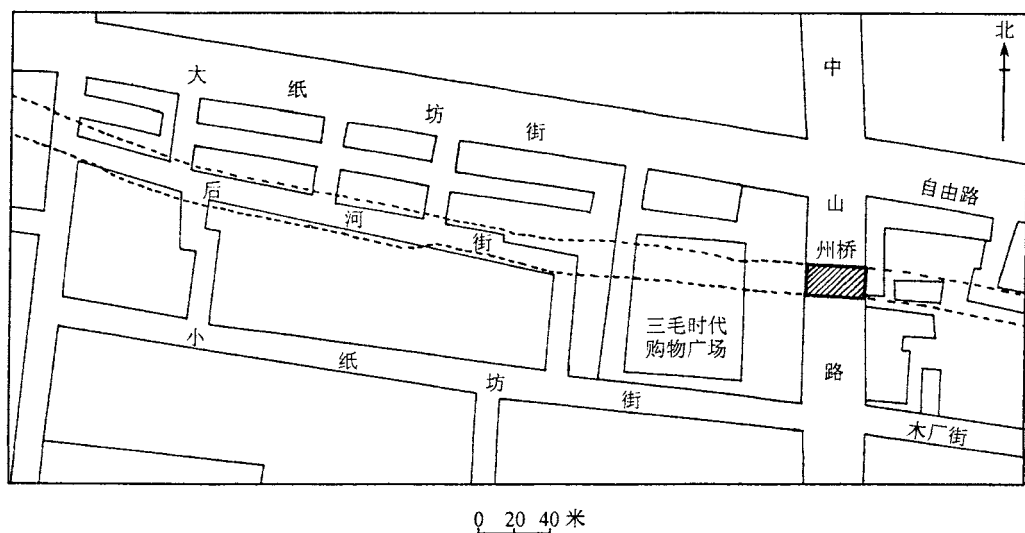
〔图三十四〕北宋晚期宫城皇城示意图(直线为笔者所加)

通的枢纽。

(一) 州桥的试掘

州桥,唐代称“汴州桥”,以在州南,故俗称州桥,五代时称“汴桥”,宋代称“天汉桥”(当时视汴河为天河),又名御桥,俗名州桥。金元时期州桥未有大的变动,明初重修,明末由于黄河水患被淤埋于地下。

州桥位于开封市南门里中山路中段,开封皮鞋厂门前,南至小纸坊街东口53米,北距大纸坊街东口50米〔图三十五〕。试掘时在开封皮鞋厂(今三毛



〔图三十五〕州桥及后河街时近汴河位置实测图

时代购物广场) 门前路面下 4.3 米左右见到州桥遗址, 桥面青石板铺砌, 石板已残缺不全。桥面石板下有厚 5—8 厘米白灰层, 其下为衬砖, 拱顶中部之上的衬砖东西顺砌两层, 余者南北纵砌, 其层数随拱券的弧度而增减。所用砖绝大部分是 $0.42 \times 0.21 \times 0.1$ 米的明代青砖, 少量为 $0.75 \times 0.27 \times 0.15$ 米的明代特大型砖, 在第一、二层衬砖之间还发现有菱形阴纹的宋代残砖。仅清理出中间桥洞 (估计原为三孔), 拱券砖砌, 三券三伏, 厚一米。拱券东西长 30 米, 拱跨 5.8 米, 矢高 3.7 米, 矢跨比为 1.27:2, 桥洞高 6.58 米。拱券东西两端下层各砌券脸石一道, 向外突出 0.15 米。桥墩青石条东西顺砌成墙形墩, 露明部分高 2.88 米。桥洞地面靠两侧墩墙各顺置二排长木 (长木截面长方形), 其余部分石板铺砌, 石板大小不一, 铺砌不甚规则。桥基采用筑筏方法, 即在河底基槽内置层层纵横交错、截面呈长方形的长木, 然后在基本上砌桥墩 [图三十六]。出土遗物较重要者, 有金代白釉赭花鱼藻纹残瓷盆一件, 元代青釉瓷碗一件, 明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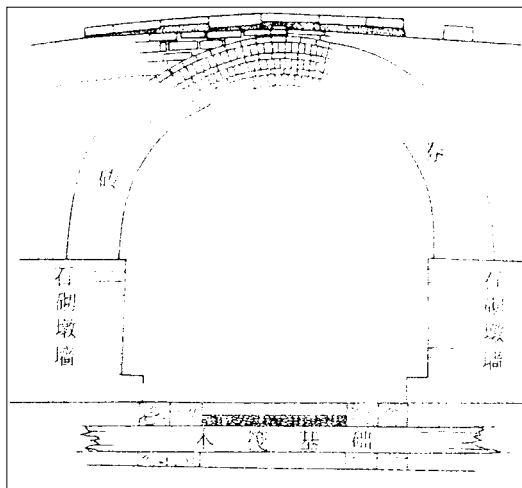
晚期黑釉瓷罐一件, 明晚期白釉八卦纹残瓷炉一件, 以及明晚期青釉和青花瓷片等。

州桥在宋神宗 (1068—1085) 时曾进行改建, 改建后的州桥张知甫在《可书》中说: “起州桥二楼, 又改桥作石岸, 以锡铁灌其缝。”《东京梦华录》卷一“河道”条记载北宋晚期州桥情况说: 州桥“正对于大内御街, 其桥与相国寺桥皆低平不通舟船, 唯西河平桥可过。其柱皆青石为之, 石梁石笋楯栏。近桥两岸, 皆石壁雕镌海马水兽飞云之状。桥下密排石柱, 盖车驾御路也”; 这种棚梁式石桥与试掘的砖石结构的拱形桥完全不同。根据该桥使用明砖, 采用明代隔层对缝砌法, 桥墩构筑形式与南京北京明代城门旁腿石墙基本相同来看, 这座桥的桥面、拱券、桥墩均为明代修造。但是, 其筏形基础符合宋代筑法, 明代时州桥的位置未变, 从而成为研究北宋开封城的重要座标之一¹。

(二) 御路

文献记载从开封外城南薰门、新郑门、新宋门和封丘门通向城内的大街称御路。南面御路从宣德门南

1 李克修、董祥:《开封古州桥勘探试掘简报》,《开封文博》,1990年,1、2期合刊。



〔图三十六〕州桥结构示意图

行经州桥、内城朱雀门、龙津桥直达外城南薰门，又南至郊坛。这条御路亦称御街，是北宋东京城南北中轴线，位于今开封旧城区南北中轴线中山路下约8米处，表明自北宋以来该中轴线千年未变。东面御路从州桥北向东，过相国寺南面横街、出内城宋门直达外城新宋门，为从东部入城之传统官道，又称汴河大街。西面御路从州桥南投西大街出内城郑门，直达外城新郑门，又西至金明池和琼林苑，亦称西大街。东、西御路与南面的御街在州桥相会，东、西御路虽然在州桥之南北分别与南面御街呈丁字形相接，但因三条御路交接点相距很近又有州桥为枢纽，所以州桥成为开封城内最大的十字路口。北面御街置于宫城东侧，具体位置是从宣德门前横街向东经东角楼、潘楼街到土市子十字街口折北行始上北面御街，北面御街即从此沿南北向的马行街至内城旧封丘门直达外城新封丘门¹。

（三）街和街巷

开封城内除御路外，宣德门前东西横街是城内东西最主要的交通大动脉。宣德门前东西横街从宣德门

前出发，向东经潘楼街、十字街（土市子）出内城旧曹门，经牛行街北拐达外城新曹门；从宣德门前出发西行，经西南角楼，又西经踊路街出梁门，过梁门大街，向西北拐直达外城万胜门（据前述考古调查资料，万胜门和新曹门位置偏北，故出梁门和曹门的大街不能与之直线相接）²。其它重要的街道除前面已提到者外，还有东华门前大街，宫城西南与南面御街并行的浚仪桥街，相国寺东门大街，保康门街（向北穿相国寺桥至汴河大桥，向南过保康门至看街亭东），北大街（梁门大街西瓮市子北至卫州门），金梁桥街（梁门大街与出郑门的西大街之间纵街）等（图二，参见本文城内功能分区部分）。此外，其余诸城门（包括部分水门）也有通向城内的街道。街道宽度大体仍后周之旧，内城御路宽约30步，外城街道宽分别为50步、30步和25步³。入宋以后由于“侵街”现象日益增多，所以街道宽度比后周还要窄些。开封城的街道，由于城门不对称，四河贯都和水门及角门的关系，街道的走向受到较大影响，形成不甚规则的方格网状。从而改变了唐代都城方格网式如棋盘，整齐划一的街道模式。北宋东京城似无纵贯南北的大街（外城南、北城门间是否有大街直接贯通，尚不清楚），大体横贯全城的有宣德楼前大街和东、西御路。城内除十字街外，丁字街较多，沿河还有斜街。在外城墙内侧则有环城路。

北宋东京城内大街，凡东西向者配置南北向的巷，南北向大街配置东西向的巷。“巷”原是坊内通道（唐长安城“坊”中通道称“曲”，但东京城也有少数称“曲”，如景灵宫有南曲等。此外，《东京梦华录》仍有“坊巷”连称的记载），到北宋东京城街已不是坊间通道（唐长安城的街是坊间通道），而变为街道

1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御街”相关条目。

2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潘楼东街条”，卷三“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条。

3 后周开封街道宽度，见《册府元龟》卷十四“帝王部·都邑”；《五代会要》卷二十六“城郭”条。

两侧商店和住宅的通道；巷亦随之变成两侧商店和住宅的通道。因此，这时的街成为连接许多巷的大道，巷直通于街，实际上是小街。这样“街巷”就代替了“街坊”结构，“街巷”制初步得以确立。上述变化，又引起了北宋东京城坊制的变革和商业网点配置的变化。

二、厢坊

北宋东京城基层行政管理实行厢坊两级制，这是我国城市行政管理结构的重要变化。它与北宋东京城街巷的发展和城内行政区划及功能分区等问题密切相关，故略作介绍。

（一）封闭式坊制的崩溃¹

早在后周时期，开封“民侵街衢为舍”已较严重，封闭式坊制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面对这种情况，周世宗修建外城时就不得不采取在“定街巷、军营、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的政策。准许街道两旁居民户，准许街道两旁民户各占街道十分之一的面积用来种树、掘井和修盖凉棚，准许京城居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鼓励临街建邸店和楼阁。从而促进了北周和宋初沿街、沿河、沿桥的新“行”、“市”、酒楼、茶坊和铺席贸易的发展，内城的東西市已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大约到北宋中期东、西市便逐渐消失了。上述措施对加速封闭式坊制崩溃的进程，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北宋初期坊制仍然存在（置坊正，坊有时也称里，置里长），太宗至道元年（995）令将旧坊改新名，“列牌于楼上”，置冬冬鼓以警昏晓（唐以来旧制），早晚按时启闭坊门，设“巡铺”维持治安。这是北宋首次明确恢复坊制，然而由于人口急剧膨胀和商业的发

展，旧坊制很难维持。文献记载，早在太平兴国五年（980）就已经出现侵街现象，以后日益严重。到真宗咸平五年（1002），为解决沿街建邸舍街道越来越窄的问题，遂拆毁侵街的邸舍，规定街和巷的宽度，登记造册，树立表柱，不准侵占街巷，恢复唐长安城的街鼓制度。这是北宋最后一次恢复坊制，但却无实际效果。由于街鼓只能控制坊门启闭，不能控制沿街居民的活动，加之早在乾德三年（965）就有开封府“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的规定²，所以这种坊制很难长久维持下去。此后侵街现象仍然不断，到仁宗初年甚至在惠民河桥上“开铺贩鬻”。在这种情况下，景祐年间（1034—1038）政府被迫让步，允许临街开邸舍。到庆历（1041—1048），皇佑（1049—1054）年间已不闻街鼓声，坊制开始彻底崩溃，街巷等得以确立。此后坊就变成单纯的行政管理单位的名称了。

（二）开封的厢坊³

北宋东京开封府下辖两个赤县，并京畿地区16县（或说17县）。东京城以大内正中御街（天街）为界，大内和天街以东，外城东部、南部和附郭属开封县，县署在丽景门（旧宋门）内。大内和天街以西，外城西部、北部和附郭属浚仪县（后改祥符县），县署在安远门（旧封丘门）外旌孝坊西。开封府署在州桥之西的浚仪桥西偏北（今开封市延庆观西北包府坑街一带）。

北宋至道元年（995）复坊制时始设厢，厢是坊之上的行政管理机构⁴。这时内城设四厢，即左一厢（20坊，大体在天街之东，宣德门前横街东段之南）、左二厢（16坊，大体在宣德门前横街东段之北，大内之东），右一厢（8坊，大体在天街之西，宣德门前

1 前引《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下编三“北宋东京的新结构和新街市”。

2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七之一。

3 前引《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296—298页；前引《宋代东京

研究》72—82页。

4 厢的管理机构，以内城为例，厢的长官为都指挥使，主管烟火盗贼及诸公事。其下设厢典、书手、都所由、所由、街子和行官等。

横街西段之南)、右二厢(2坊,在宣德门前横街西段之北,大内之西),四厢共46坊。外城四厢,即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四厢,共74坊。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在外城之外的附郭置八厢,后又增为九厢,即京东第一、二、三厢,京南厢,京西第一、二、三厢,京北第一、二厢,共15坊。真宗天禧五年(1021),外城又分为城南左厢(7坊,东南部)、城南右厢(13坊,西南部)、城北左厢(9坊,东北部)、城北右厢(11坊,西北部)、城东左厢(9坊,东部)、城西右厢(26坊,西部),共六厢75坊,至此全城达19厢136坊。到神宗熙宁四年(1071),内、外城又各恢复四厢制。开封内、外城诸厢人口数量和密度不一。以《宋会要辑稿》兵三,“厢巡”条所记天禧五年(1021)各厢户数为例,经过换算可明显看出各厢和内外城的户数比例、密度,以及各相关部位之间的户数比例关系¹。

第五节、四河贯都〔图三十七、三十八〕

开封自南而北,有蔡河、汴河、金水河与五丈河四河贯城。这四条河流不仅基本解决了都城的漕运,给水排水,近郊农业灌溉,以及为某些手工业和农业部门提供动力等问题,而且对城内的布局、交通和绿

化也有较大的影响。

一、蔡河〔图三〕

《宋会要辑稿·方域》记述惠民河时说:“(惠民河)与蔡河一水,即闵河也。建隆元年(960),始命右领军卫将陈承昭督丁夫导闵水,自新郑与蔡水合,贯京师。南历陈、颖、达寿春,以通淮右,舟楫相继,商贾毕至,都下利之。于是以西南为闵河,东南为蔡河,至开宝六年(973)三月,始改闵河为惠民河。”后来开封城内外一段,蔡河与惠民河两名互用。东引之水至开封城西10里入蔡河,经四里桥(宋代蔡河主要津渡),从南面戴楼门东广利水门入城,东北流经外城南部的中央的龙津桥,又东南经陈州门西普济水门流出城外(蔡河水门旁均无人行道)。蔡河流经开封城内河段共建十三桥,《东京梦华录》卷一《河道》条记载:“自陈州门里曰观桥,从北次曰宣泰桥,次曰云骑桥,次曰横桥子、次曰高桥、次曰西保康门桥、次曰龙津桥、次曰新桥、次曰太平桥、次曰柴麦桥、次曰第一座桥、次曰宜男桥,出戴楼门外曰四里桥。”蔡河是开封城仅仅次于汴河的重要水路交通线、舟船如蚁,所建十三桥又是城内交通必经之处。同时蔡河还是开封城南对外的水路交通线,它将开封城南的州县连接起来,开

¹ 《宋会要辑稿》兵三,“厢巡”条所记天禧五年各厢户数,以及据此换算各厢户数占内外城总户数的比例等情况,略述如下。内城,东南部左一厢,20坊,8950户,占内外城总户数97750户的9.1%;东北部左二厢,16坊,15900户,占内外城总户数16.3%。(以下省写内外城总户数):西南部右一厢8坊,7000户,约占7.1%;西北部右二厢2坊,700户,约占0.7%。外城,东南部城南左厢7坊,8200户,占8.4%;东北部城北左厢9坊,4000户,占4%;东部城东左厢9坊,26800户,占27.4%;西南部城南右厢13坊,9800户,占10%;西北部城北右厢11坊,7900户,占8%;城西部城西右厢26坊,8500户,占8.7%。全城总户数97750,以天街为界,东部总户数63850,西部总户数33900;内城总户数32550,外城总户数65200。每户以五口计,全城共约488750人。

据上所述,可作如下比较。(1)内外城户数比较。内城总户数约占内外城总户数33.2%,外城总户数约占内外城总户数66.5%,内外城总户数之比为1:2。但是,外城面积是内城面积的5倍(据前述外城,内城周长数据,换算成面积),故内城的人口密度(每户按五口计)是外城的2.7倍。(2)内城东、西部户数比较。内城东部(左一、二厢)

总户数占内外城总户数25.4%;内城西部(右一、二厢)总户数占内外城总户数7.8%;东部户数是西部户数的3.2倍。内城左二厢户数多(已超出右一、二厢户数之和),右二厢户数很少,两者不计,右一厢户数只是左一厢户数的78%。(3)外城东西部比较。外城东部(城东左厢、城南左厢、城北左厢)总户数占内外城总户数39.8%;西部(城西右厢、城南右厢、城北右厢)总户数占内外城总户数26.8%,东部户数是西部户数的1.5倍。(4)以天街为界内外城东西部户数比较。东部总户数约占内外城总户数65%强,西部总户数约占内外城总户数34.4%。东部户数是西部户数的1.8倍。

除上所述,还可看出:(1)城东部城东左厢户数最多(9坊,26800户),占内外城总户数27.4%。(2)人口密度最大的是城东北部左二厢(16坊,15900户),占内外城总户数16.2%。共户数仅次于城东左厢,因面积小,故密度最大。(3)人口数量和密度最大的是城东左厢、内城左二厢,以及内城东南部左一厢和外城东南部城南左厢。上述诸厢总户数约占内外城总户数的61%。(4)户数最少的厢是内城西北部右二厢(2坊,700户),外城户数最少的是东北部城北左厢。以上数据,对本文分析北宋京城的布局和配置有一定参考价值。

连接南北交通和经济的主要渠道。北宋时期,“汴河桓亘中国,首承大河(黄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通往东京的漕运,“汴河斛斗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诸河漕运“唯汴河所运一色粳米,相兼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实”,“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民百万,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故汴河漕运“至急至重”,“乃建国之本”¹,是北宋东京城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北宋灭亡后,因战火,黄河水淹灌等原因,汴河淤塞,明代嘉靖年间开封城内的汴河只延庆观前小砖桥下略存遗迹(俗称臭河儿),明崇祯十五年(1642)黄河水淹开封后,汴河被淤埋于地下。

宋初“以孟州河阴县南为汴河首受黄河之口”(汴口),由于黄河泥沙量大,河道淤积严重。到神宗元丰二年(1097)“导洛通汴”(又称“清汴”),使汴河与伊、洛河沟通,东西横贯今河南全省,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水路交通大动脉。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其在东京城内汴河故道的流向,经1981年以来的调查勘探已大致清楚。即汴河从西北方向自今开封西郊土城村南的“西水门”入东京外城,然后东偏南流经开封大学东北角、汽车三运公司搬运总站南侧、中药厂厂区南部、针织内衣厂西分厂东北角、开封衡器厂院内、纺织器材厂北部、消防队西环路支队院内、至二建综合加工厂后沿小西门北侧的汴河“西角门子”入东京内城;又东流沿向阳路北侧、包公祠北侧、包公西湖中部、市供销社、电影公司、后河街、皮革大世界、中山路州桥遗址,再向东经鼓楼区文教局、胭脂河生活小区北部,至“宋门”南部的汴河“东角门子”出东京内城;再折向东南经东郊煤厂,至火葬场大门西侧的“东水门”出东京城外〔图三十九〕。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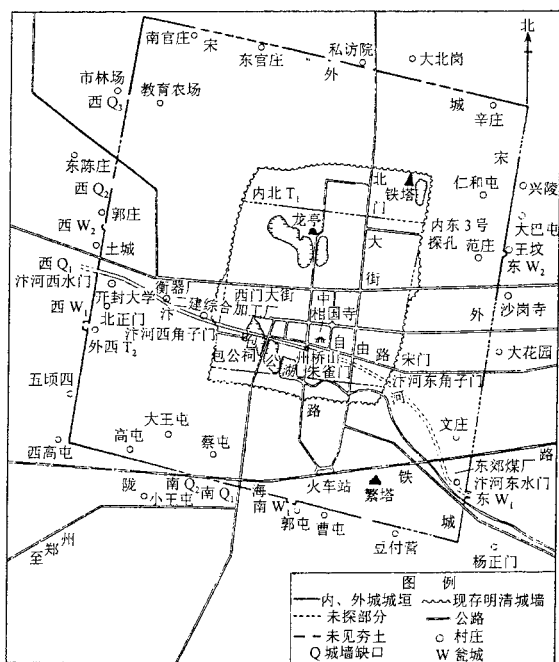
宋时期的汴河河床遗迹距今地表深9—14米。明代断流前的汴河河床遗迹距今地表深7.5—11米。河床宽度,州桥遗址两侧16米,其他地段约14—23米不等。前面已经介绍了在汴河流经城内地段发现的汴河西水门、汴河西角门子、汴河东水门及拐子城的遗迹和线索。内城“东角门子”的位置,据勘探资料初步推测约在今开封市宋门以南不远处。《东京梦华录》卷一“河道”条记载:“(汴)河上有桥十三。从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雘,宛如飞虹。其上下土桥亦如之。次曰顺成仓桥、入水门里曰便桥、次曰下土桥、次曰上土桥。投西角门子曰相国寺桥、次曰大桥……。西去曰浚仪桥、次曰兴国寺桥、次曰太师府桥、次曰金梁桥、次曰西浮桥、次曰西水门便桥,门外曰横桥。”以上诸桥除前已介绍的州桥遗址外,根据调查勘探资料可大致推断部分桥的位置。如横桥在开封西郊土城村西南部,西水门便桥在开封大学北侧,太师府桥在二建综合加工厂附近,相国寺桥在胭脂河生活小区与大相国寺之间,上土桥在宋门东南侧,东水门桥在东郊煤厂附近,顺成仓桥在火葬场东南,虹桥在今开封东郊屠府坟村与阎李寨村之间的惠济河北岸等²。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的桥〔图四十〕,大多认为是虹桥。

三、金水河〔图三十八〕

汴河之北有金水河(又名天源),其源为荥阳黄堆山之祝龙泉,下游称京水。建隆三年(961)引京水过中牟达京师,在城外汴河之上架渡槽,置斗门,入浚沟,通城濠,从西北水门(固子门北)入京城,东汇于五丈河,补充了五丈河的水源。乾德三年(965)又引金水河入大内,“历后苑,内庭池沼水皆至焉”。

¹ 《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乐全集》卷二十七“论汴河利害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淳化二年条。

² 开封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开封市宋东京城内汴河故道的初步勘探与试掘》,《考古》,1999年3期。



〔图三十九〕东京城区汴河故位置实测图

开宝九年(976)山承天门凿渠,引金水河南注晋王第。大中祥符二年(1009)决金水河为渠,“自天波门至乾元门,历天街东转,绕太庙,入后庙,皆甃以玳瑁,植以芳木。车马所经,又叠石为闸梁。作方井,宫寺、民舍皆得汲用。复东引,由城下水窦入于濠。京城便之。”天禧二年(1019)又引索水以济金水河,元丰五年(1082)金水河透水槽阻碍上下汴舟(即金水河入咸丰水门前,跨汴河架透水槽,余水河顺透水槽流过,“舟至启槽”),故自板桥别为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后卒不行,乃由副堤河入于蔡”¹。金水河上架白虎桥、横桥和五王宫桥等。

1 前引《宋东京考》卷十九“金水河”条。

2 前引《宋东京考》卷十九“五丈河”条。

3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一“河道”条。

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八,庆历六年六月丙寅条。

5 前引《宋代东京研究》188—192页,“诸运河、护龙河在城内外的连结”。

四、五丈河〔图三十八〕

最北为五丈河(因河宽五丈,故名)，“唐武后时，引汴水入白沟，接注湛渠，以通曹、兖之赋”，五丈河“即白沟河之下流也，唐末湮塞。周显德四年，疏汴水入五丈河。自是齐、鲁舟楫，皆达于汴。六年，浚五丈河以通漕运。建隆二年(961)正月，遣使往定陶规度，发曹、单丁夫数万以浚之，岁漕上供米六十二万石”²；开宝六年(973)改称广济河。五丈河从新曹门北东北水门(善利水门)入城，河上建小横桥、广备桥、蔡市桥、青晖桥和染院桥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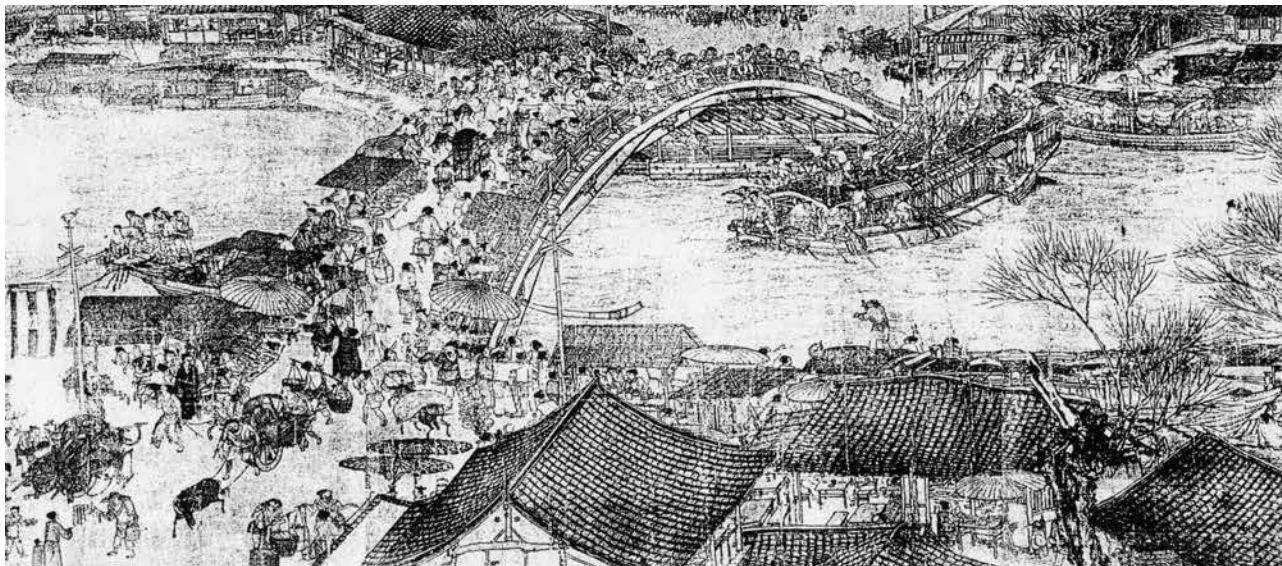
以上四河金水河是城内主要饮用水源，此外城内居民还用井水。仁宗庆历六年(1046)因久旱，在城内八厢凿井三百九十眼⁴。另外三河重在漕运，其中汴河与蔡河互通，又引汴入五丈河；元丰五年金水河城西透水漕废，金水河入汴河，然后在汴河北岸开口，引水入金水河下段。大体来说，四河互通，并以不同的方式与内、外城护城河相通⁵。

除上所述，由于东京地势广平，须赖沟洫以行水潦，护城河及汴河等则为泄水之处。景德三年(1006)，“督京城内外坊里，开浚沟渠”。天圣元年(1023)八月，又“内外八厢，创置八字水口，通流雨水入渠甚利”，“凡沟洫，上广一丈，底广八尺，其深四尺，地形高处或至五六尺，以此为率”⁶，内、外城排水沟洫共253条⁷。由于“京师内外，有八水口，泄水入汴。故京师虽大雨，无复水害”⁸。

6 前引《宋代东京考》卷十九“沟洫”条。

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四，天圣四年条。

8 王巩：《闻见近录》，知不足斋丛书本。



〔图四十〕《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图

第六节、东京城的功能分区

一、功能分区突破传统模式，形成新格局

北宋东京城是一座政治性和军事性的城市，也是一座商业和手工业高度发达的城市，同时又是全国交通和漕运的中心，故其功能分区与这些特点密不可分。但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则是政治和商业两个因素。

如前所述，后周世宗按照新的规划原则增筑外城时，就已经基本上打破了市坊制的桎梏。入宋以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新兴行市迸发崛起，各种手工业不断涌现。这样到仁宗之时，则形成了新的遍布全城的商业网，取代了集中的市制；开放的街巷，居民按地段聚居的坊巷代替了封闭式的坊制的局面，最终导致了市坊制的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北宋中期以后东京城形制布局定型期的功能分区，就彻底突破了隋唐两京按市坊进行功能分区（指宫廷之外诸功能分区）的传统模式，这是北宋东京城功能分区形成新格局的主要内在原因。

北宋东京城功能分区的新格局，主要依托于该城商业和手工业的不同配置情况。从后周到北宋，东京城商业发展的特点，是以各种行市为主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行业街市。同时伴随发展起来的各种手工业、城市服务业（如茶楼、酒肆、大小食店、邸店、日用杂品店、瓦子……，甚至还有妓馆等），以及定期的庙市，酒楼和茶坊的集市，瓦子集市，城门口、街头和桥头的集市、节日集市、早市和夜市等各种商业形式也都融入其中。这些包容广泛的商业内涵，相辅相成，其在不同区域和地段配置的差异性，就成为判定东京城不同功能分区（宫苑区除外）的重要标准之一。

其次，北宋东京城的庙、社、衙署（包括各种官署的设置）、重要寺观，居民分布（数量、密度和比例关系，见前述情况）和皇戚高官富贾邸宅等的配置情况，亦与前述的不同商业区密切相关，因而也是判断不同功能区划的重要参数。此外，东京城各功能分区中的不同地段，又往往以不同的商业形式和配置情况形成各具特色又有内在联系的小区。也就是说，东京城不同的功能区划（宫苑区除外），均是各种不同小区的共同体，其综合性很强。在这种情况下，判

断各功能区划的属性,只能以其主体商业街的性质和相关的主要配置为代表。

开封城的功能分区,内城以四条御街为主形成重要商业区,其延伸至外城的大街则是外城主要商业区。总的来看,城内各种用地混杂相间,各功能分区无明确的用地界定;居民遍布大街小巷与商业店铺等相混,无明确的单独居民区;权贵府邸相对集中于主要街道及其附近,亦置于闹市之中;官府手工业作坊按类集中分置于不同的商业区内,私营手工业散置于城内;官方惠民药局、瓦子、大酒楼、邸店、仓场和妓馆等大致分布有定;全城遍布商业网点。上述情况表明,开封城的功能分区缺乏严格地统一规划,其功能分区乃是根据城市政治、经济活动的需要和消费的需求,逐渐形成的。这种较灵活的功能分区,反映出开封城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城市职能走向多样化和城市自我更新发展能力的增强,因而形成与前代都城完全不同的功能分区。

除上所述,前面已经介绍了东京城行政管理单位“厢”的情况。东京城内城四厢,外城四厢,研究证明各厢管辖区域是与相应的功能分区基本相合的。因此,东京城作为行政管理单位的“厢”,实际上就是对东京城不同功能分区的界定,这是后周至北宋都城规划原则(如定“街巷”等)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必然结果。有鉴于此,北宋东京城的功能分区除宫苑和南面御街各为一区外(南面御街的位置和配置情况特殊),余者大体可以内城左一、二厢,右一、二厢;外城的城东、城南、城西和城北厢为准进行分区,共分十区。由于北宋东京城的功能分区改变了隋唐两京的传统,创立了新的格局,特点突出,故成为探讨和研究北宋东京城形制布局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下面有必要根据《东京梦华录》等文献的有关记载,对北宋东京城各功能分区的主要配置情况和属性略作介绍。

二、功能分区与主要配置概况

(一) 宫苑区

宫苑区包括宫城、皇城、宫廷广场,延福五位和六位,以及上清宝箓宫和艮岳。其中宫廷广场即主要中央衙署和礼制建筑区。

(二) 南面御街食店和“杂嚼”夜市区

南面御街是全城的中轴线,北接宫廷广场,“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此后主要商业区集中在州桥至龙津桥一带。

“州桥曲转大街面南曰左藏库,近东郑太宰宅,青鱼市内行”;“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¹,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指大食店)²,是较大食店的集中区。

从州桥南去至龙津桥一带,是“当街水饭”,各种荤素食品、野味、“从食”(各色蒸做糕点)、糖果等40余种“杂嚼”区,这里店铺摊位密布,夜市极盛,“直至三更”³,是“杂嚼”夜市区。

南面御街连接内城南部东、西两区,直通外城南区,是内外城的重要交通枢纽,附近两侧衙署较多,商业繁盛,来往客流很大,故在此主要形成食店和“杂嚼”夜市区。

(三) 内城东北部综合性商业中心区和主要居民、府第区

该综合性商业中心区,由三个商业区构成。

1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之“饮食果子”条说:惟州桥炭张家、乳酪张家“卖”好淹藏菜蔬,“一色好酒”。

2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之“宣德楼前省府官宇”。

3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之“州桥夜市”。

1、金融、娱乐、百货集市中心区

从宣德门前大街东过宫城东南角楼至“十字街南去,姜行”,又东至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鹞客。余皆真珠正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全银彩帛交易之所”,“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往东街北是著名的潘楼酒店,楼下是“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及售各种“杂嚼”的潘楼市,“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是东京城最大的分批集合的百货集市。潘楼东去,有东京著名的徐家瓠羹店,街南有东京最大的瓦子即桑家瓦子(娱乐中心),内有著名的瓦市。从潘楼街往东有十字街(又称土市子、竹竿市)和十字大街。十字大街“曰从行里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以东街北赵十万宅,街南中山正店”,街北郑皇后宅(宅后有宋厨酒店)。再往东至旧曹门为旧曹门街,有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又李生菜小儿药铺、仇防御药铺”,曹门处有蛮王家、乳酪张家正店等酒楼,并是军营集中之处¹。

上述情况表明,东京城最大的金融交易中心、最大的分批集合百货集市、最大的娱乐中心(桑家瓦子)和著名的瓦市,均集中于潘楼街及其两侧;往东十字大街则有鬼市。在这条街上还分布一些著名的大酒店,珍珠丝绸铺席,各类药铺,以及客店、富贾皇戚邸宅、寺观(多在土市子、鬼市子附近)和军营等。这条街是左一、二厢的界街,又是连接左一、二厢商业区的枢纽,同时旧曹门外的商业街也是该商业街的延伸。因此,其位置和地位十分重要。

2、东华门前“宫市”区

过宫城东南角楼十字街,“高头街北去,从纱行至东华门街、晨晖门、宝篆宫,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²。“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蟹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诸阁分争以贵价取之”³。又东华门外景明坊的矾楼(又名白矾楼,原似矾行的酒楼,后更名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是东京城最高大的酒楼,也是“京师酒肆之甲,饮徒常千余人”⁴。

3、马行街以手工业作坊和医药行为主的商业区

马行街商业区从南向北,可大致分为四个小区。(1)妓馆区,“土市子北去乃马行街也,人烟浩闹。先至十字街,曰鹑儿市,向东曰东鸡儿巷,向西曰鸡儿巷,皆妓馆所居”⁵。(2)马市和大酒楼区。东、西鸡儿巷“近北街曰杨楼街(有杨楼酒店),东曰壮楼,今改作和乐楼,楼下乃卖马市也。近北曰任店(著名大酒店),今改作欣乐楼,对门马铛家羹店”⁶。(3)手工业作坊和交易区。“北去杨楼以北穿马行街,东西两巷,谓之大小货行,皆工作技巧所居(为大小手工业作坊所在)。小货行通鸡儿巷妓馆,大货行通笺纸店”⁷。从此再北,“乃小货行时楼”(小货行交易之所)⁸。(4)医行、药行和大夜市区。小货行时楼附近有大骨传药铺,向北直抵旧封丘门,两侧皆“金紫医官(被皇帝册封官爵的医生)药铺,如杜金钩家、曹家独胜元(丸)、山水李家口齿咽喉药、石鱼儿、班防御,银孩儿柏郎中家医小儿,大鞋任家产科。其余香药铺席、官员宅舍,不欲遍记。夜市比州桥又盛百倍,车马阗拥,不可驻

1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潘楼街东街巷”、“酒楼”;卷一,“河道”条。

2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

3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一,“大内”。

4 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一。

5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潘楼东街巷”。

6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潘楼东街巷”。

7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

8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马行街北诸医铺”。

足,都人谓之“里头”¹。这一带是医行和药行所在地,“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²。此外,官府手工业作坊绫锦院(昭庆坊)和裁造院(延康坊)也设在左二厢³。据文献记载东京城70余家正店酒楼中,近1/3分布在左二厢。在昭庆坊、崇仁坊和旧封丘门等处,多高官巨贾邸宅。在土市子、景龙门至旧封丘门内附近,寺观也较多⁴。

综上所述,宣德门前东大街、东华门街和马行街有金银行、彩帛行、珍珠行、马行、医行、药行、大小货行,以及姜行、矾行;官府手工业作坊;官市、马市、潘楼市、瓦市、夜市、鬼市、竹竿市、鸡儿市;各种大酒楼、食店、客店和大娱乐中心(瓦子)等,分地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商业街区。这些商业街区各种商肆和手工业作坊等,数量多、密度大、规格高,内在联系密切,因而上述三条大街相辅相成,共同形成了东京城最繁华的、综合性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区。此外,左二厢还是东京城的主要居民区,人口密度最大(见前述注释),同时也是高官大贾邸宅较集中、寺观较多的区域之一。

(四) 内城东南部衙署、寺观、庙市、客店区和居民、府第区〔图二〕

左一厢的主要配置,大致可分三个小区。

1、景灵宫及其附近的小商业区

景灵东宫及其附近以宫、庙、官署和寺为主,并在这一带形成小商业区。“御街大内前南去,左则景灵东宫(原庙)”,“景灵东宫南门大街以东,南则唐家金银铺,温州漆器什物铺”⁵。“自景灵宫东门大街向东,街北旧乾明寺,沿火改作五寺三监。以东向南

曰第三条甜水巷,以东熙熙楼客店,都下着数。以东街南高阳正店,向北入马行街。向东,街北曰车辂院,南曰第二甜水巷。以东审计院,以东桐树子韩家,直抵太庙前门。南往观音院,乃第一条甜水巷也。太庙北入榆林巷,通曹门大街”⁶。“自土市子南去,铁屑楼酒店、皇建院街、得胜桥郑家油饼店,动二十余炉。直南抵太庙街,高阳正店,夜市尤盛。土市北去乃马行街也”⁷。“直北出景灵宫东门前,又向北曲东税务街、高头街、姜行后巷,乃脂皮画曲妓馆。南北讲堂巷、孙殿丞药铺、靴店。出界身北巷、巷口宋家生药铺”⁸。“政和后未,景灵宫东墙下长庆楼尤盛”⁹。据上所述,可知“自景灵宫东门大街向东”,“直抵太庙前门”的东西向大街,称作太庙街。这条街以宫(景灵宫)、庙(太庙)为主,在其附近配置一些官署,官署除前面提到的之外,还有秘书省、榷货务(天平坊)和都商税院(羲和坊)等也距其不远。此外,在太庙街及其附近,配置有佛寺、大酒楼、客店、金银铺、药铺、漆器什物铺、夜市和妓馆等。

2、以相国寺为中心的寺区和庙市

大相国寺是东京城内最大的佛寺,在“州桥之东,临汴河大街”¹⁰。传说相国寺所在地是当年魏国信陵君故宅,所以这一带称为“信陵坊”。相国寺始建于北齐文宣帝大保六年(555),名建国寺,唐睿宗延和元年(712)赐名相国寺。宋代相国寺为“皇家寺”,帝王巡幸、生辰忌日和重大节日,祈祷活动和新进士题名刻石都在寺内举行。唐宋之际,相国寺占地五百四十余亩¹¹,内外分六十四院,规模很大。此外,在相国寺附近还有些寺观,共同形成了一个太佛寺区。

1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马行街北诸医铺”。夜市,参见卷三“马行街铺席”条。

2 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

3 前引《宋代东京研究》222、226页。

4 以上参见前引《东京梦华录》,《宋代东京考》的有关记载。

5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官宇”。

6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三,“寺东门街巷”。

7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潘楼东街巷”。

8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三,“寺东门街巷”。

9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

10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三,“大内前州桥东街巷”。

11 宋代相国寺占地范围按今地说:东到鼓楼街中段,西到县马号街,南到自由路东段,北到寺后街。现在的相国寺是清代重建的。

相国寺的庙市非常著名,“每月朔望三八日即开,技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¹。相国寺“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贷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此”²。庙市“每月五次开放,百姓交易”,《东京梦华录》卷三在“相国寺内万姓交易”中,对庙市货物交易种类,分门别类布置和庙市的盛况有详细记载,兹不赘述。

相国寺除庙市外,其周围也是一个商业区。如相国寺南相国寺桥,“桥平正如州桥,与保康门相对。桥西贾家瓠羹,孙好手馒头”³。“寺东门大街,皆是幞头、腰带、书籍、冠朵铺席,丁家素分茶。寺南即录事巷妓馆。绣巷皆师姑秀作居住。北即小甜水巷,巷内南食店甚盛,妓馆亦多。向北李庆糟姜铺。直北出景灵宫东门前”⁴。

上述情况表明,相国寺庙市不仅是东京城内最大的唯一定期开放的百货集市,而且其周围还是东京城以绣作为代表的各种手工艺品,刻印书籍、制作笔墨之类的手工业作坊与交易的主要中心之一。此外,从相国寺南向东至旧宋门即东面御街,旧宋门里有著名的十三间楼大客店和无比酒店(东京著名酒店之一)⁵。

3、保康门内客店、瓦子、道观区

相国寺桥南,有“保康门潘家黄耆园(丸)。延宁宫禁(又名延宁观)女道士观,人罕得入。街西保康门瓦子,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近东西圣观、袜撚巷。以东城角定力院,内有朱梁高祖御容”⁶。保康门附近有李庆家酒楼⁷。

综上所述,可指出四点。第一,左一厢从北到南,

太庙街、相国寺及其附近、保康门内三者的主要配置和商业分工较清楚。第二,左一厢的商业以相国寺庙市及其附近铺席为主。从商业角度看,该小区是连接沟通南北两小区的枢纽。第三,太庙街的商业除与相国寺商业关系密切外,还与宣德门前东大街和州桥附近街市有较多的联系。第四,左一厢是内城的主要居民区之一(20坊,8950户),其户数仅次于左二厢,厢内散布有皇戚(如信陵坊有昭宪皇后等邸宅)和高官(如崇德坊和昭德坊等)的邸宅。

(五)内城西北部军营区

宫城之西,踊路街之北属内城右二厢。宫城西角楼西去是踊路街,街“南太平兴国寺后门,北对启圣院街,以西殿前司相对清风楼,无比客店,张戴花洗面药,国太丞张老儿金龟儿,丑婆婆药铺,唐家酒店,直至梁门”⁸。踊路街是右一、二厢的界街,右二厢的商业主要依托于此街,厢内有殿前司和军营,居民很少(2坊,700户)。

(六)内城西南部衙署、官府手工业区、铺席区与居民、府第区

内城西南部指踊路街南,南面御街之西的右一厢。厢内主要配置情况,《东京梦华录》记载:“大内西去,右掖门祔庙,直南浚仪桥。街西尚书省东门,至省前横街,南即御史台,西即郊社。省南门正对开封府后墙,省西门谓之西车子曲,史家瓠羹、万家馒头,在京第一。次吴起庙,出巷乃大内西角楼。”⁹宣德楼前“右廊对右掖门,近东则两府八位,西则尚书省。御街大内前南去,左则景灵东宫,右则西宫。近南大晟府,次曰太常寺”;景灵西宫“南曲对即报慈寺街,都进奏院、百钟(种)园(丸)药铺,至浚仪桥大街。

1 前引《宋东京考》卷十四,引《尘史》。

2 前引《宋东京考》卷十四,引《燕翼诒谋录》。

3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三,“大内前州桥东街巷”。

4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三,“寺东门街巷”。

5 前引《宋代东京研究》296页。

6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三,“大内前州桥东街巷”。

7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

8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三,“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

9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三,“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

西宫南皆御廊杈子,至州桥投西大街,乃果子行。街北都亭驿(光化坊内),相对梁家珠子铺。余皆卖时行纸画花果铺席。至浚仪桥之西,即开封府。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至朱雀门街街西,过桥即投西大街,谓之麴院街。街南遇仙正店¹,前有楼后有台,都人谓之台上。此一店最是酒店上户,银瓶酒七十二文一角,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街北薛家分茶、羊饭、熟羊肉铺。向西去皆妓女馆舍,都人谓之院街。御廊西即鹿家包子,余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药铺、居民”²。

据上所述,可归纳为四点。其一,宣德门南御街西和浚仪桥大街两侧,向南直至浚仪桥北,是中央衙署(包括郊社)和开封府所在的衙署区。该区有少量食店和药铺,其商业主要依托于北部踳路街街市和南部州桥附近的商肆。其二,杨奂《汴故宫记》说:“遵御路而北,横街也,东曰太庙,西曰郊社”³。由此可见,郊社及其所在的横街与太庙街和太庙是东西相对的。其三,州桥与浚仪桥之间及州桥南面之西,除都亭驿和果子行外,大都是一些消费性的铺席和“杂嚼”店等,该处应是州桥诸“杂嚼”店和夜市区的延伸,这里居民较多。其四,过州桥向西的西大街即西面御街,俗称曲院街。官府造酒作坊“都曲院”即设在曲院街敦义坊,规模较大(步磨30盘,用驴600头,役兵士428人,每年磨小麦4万石⁴)。这一带分布有食店和酒楼等。又妓馆区在西大街西边,称院街。此外,官府手工业作坊东西作坊(兴同坊)、弓弩院(宣化坊)、弓弩造箭院(兴国坊),以及杂买务(常乐坊)等官署也设在右一厢。其中东西作坊共52作,有兵校和匠共7931人,是城内最大的作坊之一⁵。总之,

该区以衙署和官府手工业作坊区为主要特色,其商业色彩远逊于内城东南部(左一厢)。由于衙署和官营手工业作坊占地面积较大,所以其居民(8坊,7000户)也少于内城左一厢。右一厢的寺观和大邸宅以宜秋门内居多。

(七) 外城东部瓦子、客店、仓场、作坊区和主要居民区

外城东部为城东厢(城东左厢),区内主要配置可分三大部分。

1、旧曹门外商业区

“出旧曹门(“福田院,在旧曹门外”⁶),朱家桥瓦子。下桥,南斜街,北斜街,内有泰山庙(东岳庙),两街有妓馆。桥头人烟市井,不下州南。以东牛行街,下马刘家药铺,看牛楼酒店(牛行所在),亦有妓馆,一直抵新城”⁷。该商业区应是宣德门前东大街中心商业街的延续。

2、旧宋门外商业区

旧宋门外有著名的仁和酒楼和姜店(正店),客店较多。新宋门里街北有上清宫,“以西茆山下院”,景德寺在上清宫背,寺前有桃花洞,皆妓馆”⁸。这条街上的大酒店、客店等与其南的漕运区有密切关系。

3、沿汴河大街库场、客店、作坊和街市区

出旧宋门旁东角门子至东水门,称沿汴河大街;出东水门至虹桥则是沿汴河大街商业区的延伸。这里是汴河漕运物资入城的主要水、陆交通线,沿途分布不少官府的米麦仓库(如虹桥元丰仓、顺成仓、东水门里广济仓等)和大堆垛场,有许多新兴的行市(如斛斗行即米麦行,面行等)和供客商堆货、寓居与交易的客店。著名的《清明上河图》表现的就是虹桥至

1 该店或为《东京梦华录》卷四,“会仙酒楼”所记“新门里会仙正店”。

2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

3 《元文类》卷二十七。

4 前引《宋代东京研究》227页。

5 前引《宋代东京研究》207、208页。

6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三,“上清宫”条。

7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潘楼东街巷”条。

8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条;卷三,“上清宫”条。

东水门（一说通津门）沿河街市的盛况。此外，提点食场（汴阳坊）、抽税箔场（崇善坊）、提举修造所（显仁坊）、铸钱务（显仁坊）、东、西八作司的东司（安仁坊）等均设在城东厢。在东水门外的官营水磨加工有水磨百盘，规模很大¹。因此，城东厢也是重要的官府手工业作坊区之一。除上所述，城东厢还是东京城居民最多之处（9坊，26800户），这是与漕运、地处水陆交通要冲密切相关的。

（八）外城南部文教、寺观区和居民区

外城南部称城南厢，城南厢一度以南面御街为界分为城南左厢和城南右厢，两厢的配置既有区别，又有内在联系。

1、城南左厢

“出朱雀门东壁亦人家，东去大街麦秸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街。其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过龙津桥南去，路心又设朱漆杈子，如内前。东刘廉访宅，以南太学、国子监。过太学又有横街，乃太学南门。街南熟药惠民南局，以南五里许皆民居。又东去横大街，乃五岳观后门。大街约半里许，乃看街亭，寻常车驾行幸，登亭观马骑于此。东至贡院、什物库、礼部贡院、车营务、草场街。街南葆真宫，直至蔡河云骑桥。御街至南薰门里，街西五岳观，最为雄壮。自西门东去观桥、宣泰桥，柳荫牙道，约五里许，内有中太一宫、佑神观。街南明丽（一作庆）殿、奉灵园，九成宫内安顿九鼎。近东即迎祥池……”²。又“婆台寺在陈州门里”³，寺在禹王台之西（宋代在台上建庙以祀二姑，

故又称二姑台）。地涌寺在陈州门里南草场巷，显静寺亦在陈州门里⁴。此外，朱雀门外有果子行，“纸画儿亦在彼处行贩不绝”⁵。

“出保康门外，新建三尸庙、德安公庙。南至横街，西去通御街曰麦稍巷口。以南太学东门，水柜街余家染店。以南街东法云寺，又西去横街，张驸马宅；寺南佑神观后门”⁶。

2、城南右厢

“龙津桥南西壁邓枢密宅，以南武学巷内曲子张宅、武成王庙。以南张家油饼，明节皇后宅。西去大街曰大巷口，又西清风楼酒店，都人夏月多乘凉于此。以西老鸦巷口军器所，直接第一座桥。自大巷口南去延真观，延接四方道民于此。以南西去小巷口三学院，西去直抵宜男桥小巷。南去即南薰门，其门寻常士庶殡葬车舆皆不得经由此门而出，谓正与大内相对。唯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数十人驱逐，无有乱行者”⁷。此外，在戴楼门有“张八家园宅正店”⁸，饼店“唯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或即前述之张家油饼）、皇建院前郑家最盛”⁹。

综上所述，可归纳六点。其一，朱雀门至龙津桥两侧（以东侧为主），应属前述州桥至龙津桥商业区。其二，龙津桥南太学南门横街东西一线之北是文教区，御街东西两边是居民区，西区大邸宅较多。其三，太学南门横街至南薰门和陈州门内，是观（五岳观、佑神观）、宫（葆真宫、中太一宫、九成宫）、殿（明丽殿）、园（奉灵园）、池（迎祥池）、院（贡院）、库（什物库）、营场（车营务草场）、寺（婆台寺、地涌寺、显静寺）等的集中区。其四，御街之西大致与太学

1 前引《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293页；前引《宋代东京研究》209、219、221页。

2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朱雀门外街巷”。

3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三，“上清宫”条。按婆台即繁台（繁读Po）。后周在台上建天清寺，北宋开宝年间建慈塔，又名天清寺塔，俗称繁塔。

4 前引《宋东京考》卷十四、十五“寺”条。

5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三，“天晓诸人入市”条。

6 前引《东京梦华录注》卷三，“大内前州桥东街巷”条。按该条“寺南佑神观”后无“后门”二字；李七彪注《东京梦华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有“后门”二字。

7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朱雀门外街巷”条。

8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条。

9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四，“饼店”条。

南门横街相对的大巷口、老鸦巷口一带,是军器所、三学院和延真观所在地,有少数大酒店。其五,保康门外以麦秸巷与朱雀门外相连接,佑神观后门则与前述第三点的寺观区相接。其六,活猪从南薰门入城,朱雀门外杀猪巷(肉行所在?)似与此有关。此外,外城南部还是东京城内仅次于城东厢的主要居民区。其中城南右厢居民(13坊、9800户)多于城南左厢(7坊,8200户),这个情况似与城南左厢寺观和官署较多,占去的面积较大有关。

(九) 外城西部一般性官方机构、寺观、瓦子、鱼行、铺席和府第区

外城西部属城西厢,出梁门的梁门大街是其中心商业街。“出梁门西去,街北建隆观,观内东廊于道士卖齿药,都人用之;街南蔡太师宅。西去州西瓦子,南自汴河岸,北抵梁门大街,亚其里瓦,约一里有余,过街北即旧宣城楼。近西去金梁桥街、西大街、荆筐儿药铺、枣王家金银铺,近北巷口熟药惠民西局。西去瓮市子,乃开封府刑人之所也。西去盖防御药铺,大佛寺,都亭西驿,相对京城守具所。自瓮市子北去大街,班楼酒店,以北大三桥子,至白虎桥,直北即卫州门”¹。据前述考古调查试掘资料,万胜门位置偏北,不与梁门直对,故上述记载未明言西去所抵之城门。此外,在梁门外寺院较多,同文馆在梁门外延秋坊之安州巷,礼宾院亦在延秋坊。

除上所述,梁门大街之南,旧郑门(宜秋门)外有“河王家、李七家正店”²,有瞻云馆,寺院较多,并有些大邸宅,在固子门里也有部分寺院³。又新郑门、西水门、万胜门每日早晨有数千担生鱼入门⁴,是

鱼行之所在。大通门设有管理水磨的大通门务⁵。磁器库、都茶场、牛羊司分设在城西厢的建隆坊、顺成坊和普宁坊⁶。此外,在汴河西水门与内城西角门子间有沿汴河大街,配置不详。

总之,城西厢的特点是散置的一般性官方机构较多,梁门和宜秋门外附近寺观和大邸宅较多,外城门内也多有寺观。较有代表性的配置还有鱼行、州西瓦子、惠民西局,并有少量大酒店。城西厢在外城中居民最少(26坊,8500户),仅是城东厢居民的1/3,城南厢居民的一半,城北厢居民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十) 外城北部商肆、军营、手工业作坊、寺观、居民和府第区

外城北部属城北厢,曾一度分为城北左、右厢。外城城北厢以东部(左厢)较繁华,为马行街商业区向北之延伸。马行街北去,“旧封丘门外祆庙斜街、州北瓦子,新封丘门大街,两边民户铺席。外余诸班直军营相对,至门约十里余。其余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夜市繁盛⁷。又太宗时,在“景龙门外新作四廐,名曰天驷监,左右各二”,雍熙初改“天驷监为天厩坊”⁸。

此外,东西八作司西司设在城北厢安定坊,水磨务东西务分设在城北厢的永顺坊和嘉庆坊,茶汤步磨务设在城北厢崇庆坊,来远驿设在城北厢崇化坊,班荆馆设在封丘门外⁹。封丘门内外一带大邸宅较多,封丘门外夷山及其附近有以开宝寺为代表的

1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条。

2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

3 前引《宋东京考》卷十二,“宅、宫”,十四“寺”、十五“寺、祠、庙”条。

4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四,“鱼行”。

5 前引《宋代东京研究》218页。

6 前引《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293页。

7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三,“马行街铺席”。该条后面所记夜市,不明指马行街,还是封丘门外情况。前引《宋代东京研究》255页认为:夜市包括门内马行街及门外新封丘门大街。这早的夜市通晓不绝,为都城夜市、酒楼极繁盛处。据此,“其余坊巷院落”之下,亦同指封丘门内外。

8 前引《宋东京考》卷三,“诸司”引《山堂肆考》。

9 前引《宋代东京研究》209、216、219、615页。

寺观群¹。景龙门和金水门外也散布一些寺观，五丈河沿岸仓较多²。

上述情况表明，封丘门外为寺观、府第和瓦子区。新封丘门大街与城内马行街相连，是主要居民区，商业以茶坊酒店、勾肆饮食为主，夜市繁荣并与马行街相连，同时这里又是军营区。五丈河沿岸是仓储区。城北厢其它部位具体配置不详。据前所述，城北左厢居民密度似较大，但其户数（9坊，4000户）却只是城北右厢居民（11坊，7900户）的一半。这个情况似与城北左厢大寺院、大邸宅、军营、作坊、仓储、商肆等所占面积较大有关。

第七节 东京城形制特点与布局艺术

北宋东京城的形制布局，是从唐、北周到北宋陆续完成的，北宋中期以后定型。在此过程中，北宋东京城的形制和布局形成许多承上启下的新特点。下面就据前述情况，略作归纳。

一、形制特点

（一）总体形制特点〔图二〕

1、从三城环套发展为四城环套

东京城在北周时就已经形成外城、内城和宫环套的形制，入宋以后承袭了此种模式，并进一步予以完善。从东京三城环套演变过程来看，不仅与北魏洛阳城较相近，而且此种形制最早也只能溯源到北魏洛阳

城³。北宋以后，除南宋临安城外，其他都城大都是三城组合。各城平面多仿东京城呈方形或近似长方形，少数呈长方形。有的都城总体平面构成形式虽有变化，但追根溯源均与北宋东京城三城相套形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⁴。此外，北宋晚期出现皇城环套宫城之势，基本呈现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四城环套的形制，这是唐代以后宫城皇城形制关系的重要变化。宋代以后，皇城环套宫城遂成定制。

2、四河贯都

东京城四河分别从城南、中和北部穿流而过，各河流向不一，有的河段曲度和斜度较大，因而对城内的形制布局有较大影响。可以说东京城内形制布局的特点，大多与四河入城有一定关系（后文有说）。东京城四河贯都，是与此前河流状况，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科技水平密切相关的。但是，不可否认四河贯都也与前代影响有关，并对后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⁵。

3、内、外城都有护城河

东京内、外城都有护城河，护城河与入城之四河直接或间接相通，共同形成东京城水道网。护城河除防卫功能外，还有给水排水功能。内、外城护城河的形成，乃是自唐代以来不断对该城进行改建、扩建，前后沿袭和发展的结果。

（二）内、外城形制特点

1、外城墙有瓮城、敌楼、马面和防城库

瓮城、敌楼、团楼、战棚和马面原多见于边城，

1 开宝寺在旧封丘门外斜街子，北齐天保十年建，称独居寺，唐改称封禅寺，宋开宝三年改开宝寺。经宋扩建，全寺分为仁王、福胜、上方、永安等二十四个禅院，以仁王院最盛，共二百八十区。庆历四年寺内灵感塔毁于雷火，皇佑元年又重建褐色琉璃砖塔，俗称铁塔。开宝寺是宋代名刹，也是东京最大的佛寺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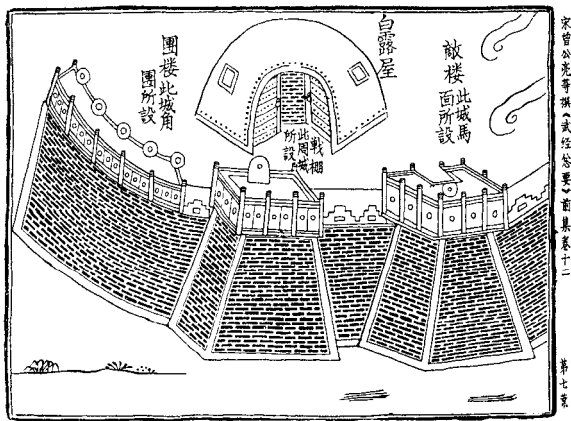
2 前引《东京梦华录》卷一，“外诸司”：“州北夷门山，五丈河诸仓”。

3 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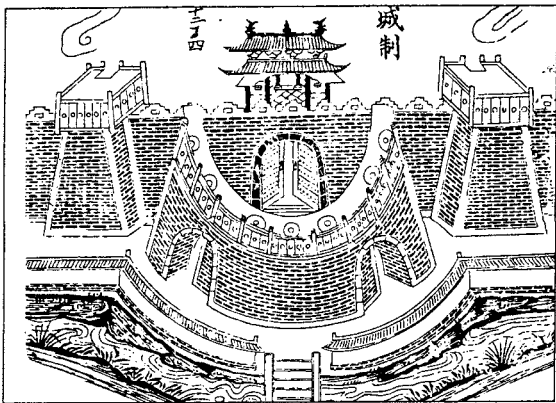
4 如辽上京“拟神都（指开封）之制”，金上京仿辽上京。两京根据当时的情况和自身的需求，将两个大城作南北毗连的形式。辽上京大内在北面的皇城内，金上京皇城在南面的在城内，上述形制实际上就

是从开封三城相套形制演变而来的。明南京和明北京城，则又演变成另外的三城模式。

5 我国自汉长安城以来，历代都城都很重视漕运和都城引水问题。到北魏洛阳城时，外郭城的南部跨洛河而建，沿外城还有谷水、阳渠和长分沟。唐东都洛阳城，洛河横贯于皇城之南，洛河上多处建桥连接两岸交通，在城南还有伊水，北有缠水，西北有谷水入城。由于开封与洛阳相距较近，开封营建过程中又有意模仿唐东都洛阳城，所以四河贯都也不排除受上述二城的影响。北宋以后，南宋临安城四河南北向入城，总体情况与开封较相近。再后，金中都和元大都城内引水和漕运问题，也都借鉴了北宋开封的经验。



〔图四十一〕《武经总要前集》敌楼、团楼、白露屋图



〔图四十二〕《武经总要前集》瓮城形制图

北宋东京城首次将其全面用于都城〔图四十一〕¹，凡此均为后世都城所沿袭。外城正门“皆直门两重”，瓮城平面长方形；其余城门的瓮城“屈曲开门”，瓮城下面呈半圆形〔图四十二〕，两种瓮城形制共存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外城增设防城库前所未见，明南京城墙的藏兵窝铺或此发展而来。

2、城门配置多不对称，水门多

北宋东京内外城不是同时设计营建的，加之四河贯都等原因，致使外城东和西、南与北城墙城门数量

不一，城门间距不等，配置多不对称；内城的东和南北向城门间也有不直对者。从而改变了城门间距大致相等，城门基本对称配置的传统。此外，由于四河贯都，使外城出现六座水门，内城有东、西两个角门子，水门数量之多超过已往的都城。

3、城内辟四条御路

东京城内东、西、南、北各辟一条御路，此现象在中国古代都城中是个孤例。

4、街市、街巷取代规整划一的市和坊

北宋东京城基本上实现了从封闭式的坊、市向街巷、街市和厢坊制的转化，因而改变了隋唐都城街道和坊市规整划一的格局。这是北宋东京城内布局较前期最大的变化之一，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元大都胡同制的先河。

5、四河贯都对城内布局影响较大

由于四河贯都的流向不一，故各河出入城的水门和角门位置难以规范化，所以又影响到城门的位置，使城门不能等距离对称配置。进而又间接影响到城内主要街道的走向，以及主要街道和重要建筑的规整对称配置。四河分别横向斜贯城内南、中和北部，城内被四河切割，因而直接影响到相关部位的形制布局。

6、城内形成水陆复合型交通网络

东京城内以四条御路和其他城门通向城内的大街为主干，辅以街巷，形成陆路交通网络。此外，四河贯都不仅是中国古代都城较成功地解决漕运问题的范例，而且还使水路成为城内的交通线，并对陆路交通产生较大的影响。比如，城内河段曲度较大之处多出现斜街；四河之上桥很多，桥的位置又影响到相关街道的走向和交接点，形成较多的丁字街。东京城内似无纵贯南北的大街，宣德门前有一条横贯东西

1 A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八，熙宁八年九月丙寅条记载，御史蔡承禧认为外城“土脉坚致，粗亦完好，何必高深，楼橹以拟边疆”。内地城市出现瓮城的实例，最早见于唐扬州城西门瓮城遗址。B 前引《傅

熹年建筑史论文集》302页说：敌楼建于马面上，团楼建于城角，弯曲呈弧线，战棚建于瓮城上；白露屋是在这些棚、楼平屋顶上的瞭望用的小窝棚（图四十一）。

的大街，西和东面御街以州桥为枢纽基本东西连通，以此结合前述的丁字街、斜街等，街道配置不拘一格，改变了过去都城街道规整如棋盘的格局。总之，东京城内的街道网络通过诸桥与水路相辅相成，形成了水陆复合型的城内交通网络。

7、功能分区与城内行政区划相结合，并呈多元化的复合形式

如前所述，东京城的行政区划是内、外城各四厢，各厢所辖范围分别对应城内总体布局中的一个主要区域和主要功能分区（宫苑和南面御街除外）。前面将东京城分为十个功能区划，除宫苑和南面御街外，其余功能区划均呈多元化的复合型式。各功能区划都是由不同地段不同的商业街及其相辅的商业网为主构成的，各功能分区大都是由商市、酒店、茶坊、食店、药铺、瓦子、妓馆、寺观、衙署、大邸宅、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等诸多因素的不同组合而呈现出差异性。

8、有较完整的给水排水系统

东京城内四河与内外城护城河相通，城内还大量凿井，修排水沟洫，共同组成较完整的给水排水系统。

9、构建技术有新发展

东京城构筑城墙承袭了前代剖面呈梯形，置排水设施等传统。其发展主要是城墙夯层间加黏土（粘合剂）或垫碎砖瓦。这种构筑技法前代使用较少，自此之后则广为采用。又宋对后周时期外城墙进行了大规模的增筑和整修，其方法成为后世同类情况的典范¹。此外，宫城墙内外包砖，城门有包砖迹象²也是其特色之一。

¹ 明北京城改筑元大都城墙的做法与宋东京城增筑整修后周外城墙的方法近似，参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第四章第一节，北京燕山出版礼，1990年。

² 据报导，1997年宁波发现的唐明州城城墙夯土两侧包砖，其后的宋宫城墙亦包砖，墙基采用石结构。由此可见，城端包砖似出现较早，但普遍使用则很晚。宋宫城墙包砖，当是承袭了东都洛阳宫城城墙的做法。

（三）宫城、皇城的形制特点

1、“择中立宫”、“前朝后寝”、皇城呈环套宫城之势

宋代东京的宫城位于外城中部偏北，这个位置较前代更好地体现出“择中立宫”说。其次，又出现有别于前代的皇城呈环套宫城之势。但是，北宋东京在元丰之前，一些中央衙署散布在大庆殿与文德殿之间或近旁，此部位的皇城与宫城外朝间无明显界限，则有别于唐东都洛阳的宫城和皇城³。东京宫城的布局仍承袭“前朝后寝”的传统，然而，由于外臣活动范围直到东、西华门横街之北，却未能真正体现出“朝”、“寝”的明确界限。

2、宫城有角楼和东、西华门

宫城有角楼和东、西华门，成为尔后宫城设计的通例。角楼出现较早⁴，东、西华门是新出现的设置，对后世影响较大。

3、主要宫殿平面呈“工”字形，殿后有阁，宫殿配置出现双轴线

主要宫殿“工”字形，大殿左右带挟殿，殿后有阁，周围有廊庑，是当时宫殿典型的布局方式。其中主要宫殿配置未能沿一条中轴线安排（是旧宫改造的特点），而出现双轴线，似仿唐东都洛阳宫城含元殿和宣政殿的配置形式⁵，双轴线对后世影响较大。

4、宣德楼“列五门”，“曲尺朵楼”，“下列两阙亭相对”

“双阙”乃遵循古制，宣德楼上述之总体形制对后世影响较大，并很可能成为后代午门翼以两观形式之滥觞。

5、有阁门和钟鼓楼

文德殿左右有东、西上阁门，为举行重要仪式

³ 隋唐洛阳城，参见前引《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隋唐洛阳城遗址”条。

⁴ 汉长安城未央宫四隅有角楼，应是尔后宫城出现角楼的先声。

⁵ 参见杨焕新：《试谈唐东都洛阳宫的几座主要殿址》，收在前引《汉唐与边疆考古学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4年。

的场所,这是宋代宫殿建筑的特点之一。又大庆殿、文德殿庭院置钟鼓楼,宋代以后则演变为文、武楼。

6、出现准T字形宫廷广场和“千步廊”雏型

据前所述,宣德门前横街与南面御街百余丈略形成准“T”字形、开放式的宫廷广场,开启后世“T”字形宫廷广场之先河。南面御街安立黑漆杈子、街心安朱漆杈子,对尔后有较大影响。实际上黑漆杈子、朱漆杈子,就是后来“千步廊”的雏型。

7、宫廷广场两侧置左祖右社和主要中央衙署

元丰改官制后,宫廷广场两侧(以西侧为主)置主要中央衙署,并按左祖右社原则分置太庙和郊社。这种配置形式上承北魏洛阳城¹,下启后世,影响深远。

8、宫城与园林紧密结合

宫城除后苑外,后来在宫城之北建延福宫和延福第六位。这种配置关系,实际上是北魏洛阳城和隋唐两京宫城与其北部设置关系的演化²。唯延福宫,特别是延福第六位已园林化,再加之艮岳和后苑,可以说宫城已与园林紧密结合为一体,形成宫苑区。这个特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9、金水河为宫城供水系统

北宋宫城以金水河为供水系统,此后宫城供水之河渠多沿用金水河一称。

二、布局艺术与绿化

北宋东京城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四城相套,宫城皇城、宫廷广场和皇家园林(延福宫、延福第六位)位于城内中轴线上。城内以东、西、南、北四条御路和宣德门前东西大街为主干,将内、外城连接起来,并分别连通各个街巷,以干道布局艺术构成全城的骨架。四河贯都横卧于城内南、中和北部,河上镶

嵌的座座大小桥梁形制各异,连接着纵横交错的大小街道,形成靓丽的景观。四河与内、外城的护城河以不同的方式相连通,又使开封城环抱于绿水之中。总之,上述情况表明东京城总体平面构图整体性较强,协调而有层次感。

东京城作为都城是一座高度政治化的城市,故城内布局必然以城市中心布局为主调,以皇权至上思想为主导而突出中轴线布局艺术。如前所述,宫城皇城大致位于外城中央偏北,内城北部中央偏西北,座落在中轴线的北端,基本符合“择国之中而立宫”说。但是,由于宫城皇城较狭小,所以宋代采取了一系列布局手法,以突显宫城皇城的崇高地位。比如:

(1) 采用宫廷广场和中轴线相结合布局手法,延伸宫城建筑群的影响。即在皇城之南中轴线上辟宫廷广场,中轴线两侧置左祖右社和主要中央衙署,同时将中轴线辟为城内最主要的南面御街,并向南延伸,过州桥直抵外城南薰门。(2) 以辅助建筑扩大宫城建筑群的体量感、美感和鸟瞰效果。即后来在宫城之北建延福宫和延福第六位,并使之园林化;在宫城北景龙门内和旧酸枣门外附近建规模宏大的道观³,又在宫城东北集南北园林艺术之大成建万岁山(艮岳),景龙门内的上清宝篆宫和艮岳通过复道等与宫城连为一体,从而增大了宫城的体量感、美感(北部园林化建筑群和艮岳)和鸟瞰效果(大道观和艮岳)。(3) 以干道和区划布局艺术烘托宫城的中心地位。即以宫城皇城为中心,在其南和东面分别伸展南、东、西和北四条御路,其中南面御路是东西分割全城的界标。又在宣德门前辟横贯全城的东西大街,并使之成为南北分割全城的界标。这样全城的行政区划(即前述内城四厢、外城四厢)和主要功能区划(见前述

1 参见前引《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汉魏洛阳城遗址”条。

2 参见前引《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条;参见前面有关北魏洛阳城、唐洛阳城的有关注释。

3 从宋真宗开始,掀起崇道高潮。于是在宫城北之两端的天波门外以东,旧酸枣门以西建玉清昭应宫(后改万寿观),在景龙门东对景晖门建上清宝篆宫,这两座宏大建筑与宫城呈鼎足之势。

情况)均以宫城皇城位置、南面御街和宣德门前东西大街为准,使主要中央衙署和主要商业区均在宫城皇城周围。因此,宫城皇城不仅在形式上是全城的核心,而且在都城功能配置上更是全城的核心。总之,北宋东京城以“唯我独尊”,皇权至上的设计思想,采取多种布局手法,将都城中心布局艺术和中轴线布局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创出新格局。

其次,东京城又是一座高度商业化的都城,商业的发展最终促使封闭式的坊制和市制走向崩溃。因而开封除宫城皇城之外,布局一改过去整齐划一的布局模式,街、巷配置相对自由,形式多种多样。城内功能分区也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各功能分区大致有定而又富于变化。其中以四条御路街市结合漕运水路和诸桥组成较庞大的商业区,是开封城的主要特色之一。在这些商业区内,众多的居民,穿梭般的漕运,繁华的商业,各种发达的手工业,星罗棋布的酒楼、茶坊和歌馆,杂处其间的勾栏瓦子等,共同组成了一幅生气盎然的画卷。就内城来说,主要商业区的布局,都围绕在宫城皇城的东面和南面(参见前述功能分区部分)。即内城商业街区的布局,乃是以宫城皇城为中心而展开的,明显具有为皇家和达官显贵服务的性质。如此布局,是皇权至上和商业化相结合在都城布局上的反映,也是与前代都城布局的主要区别之一。除上所述,城内其他功能分区仍然是以商业街市为主线,其他因素如寺观、瓦子、大邸宅、一般性衙署和官府性质的设置、官府手工业作坊、官营药局等,大都散置于城内各功能分区,基本照顾到城内各区划配置的均衡性。

东京城另一特点是建于平川,地势缺少起伏变化。加之北宋建都之前,由于连年战乱,水利失修,

土地盐碱程度高,植被破坏严重,风沙成灾(宋人形容当时东京“每风起,则尘沙扑面”,“风吹沙度满城黄”)。为改善生态环境,美化都城,又辅以多层次的城市绿化和园林建设。在内城北部,宫城空地种树木、竹子和花草。到北宋末宫城后苑、延福宫、延福第六位、艮岳与宫城浑然一体,成为城内最大最美的园林区。在城外还分布有四大皇家园林,即玉津园(又名南御园,始建于后周,在南薰门外)、宜春苑(新宋门外道南,又名东御园、瑞圣园(又名北园,一度改名含芳,在景阳门外道东)、琼林苑与金明池(琼林苑,俗称西青城,在新郑门外道南,金明池在道北与之相对,两者实属一座园林,金明池开凿的目的是练习水战〔图四十三〕,以龙舟争标最引入注目,对此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图四十四〕有生动的描绘)。此外,在外城护城河的内外,“皆植榆柳,粉墙朱户”,“夹岸皆植奇花珍木”,形成环城50里的绿化带。在流入城内的四河沿岸广植榆柳,“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荫”,五岳观西门至观桥、宣泰桥一带,“柳荫牙道,约五里许”。城内御路沿线种花卉果树,特别是南面御街渠水清澈,“翠柳荫浓绿水长”,从冬天至秋天鲜花盛开,“望之如绣”,满城风送花香。城内一般干道则广植榆柳和槐树,衙署、寺观等均植花草树木,京城居民更是绿化成风,养花蔚为大观。酒家还“以菊花缚成洞户”进行立体绿化,京城每年都举行“赛菊会”和“菊花会”。城内外高官富豪私人园林众多,如景龙门北永宁里的静渊庄、撝芳园,园林达百亩;景龙门北的景华苑,固子门里东北的芳林园,梁门外蔡京园第;以及“州东宋门外麦家园、虹桥王家园、州北李驸马园……,西水门外养种园,州西北有庶人园……,其他不以名著约百十,不能悉记也”¹。

1 《枫窗小牋》卷下。

